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
總理文藝部
一、傾瀉刊之九

國都南京的認識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

旧参
K 295.3/
G D N

總 理 遺 像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國都南京的認識目錄

頁數

一 國都南京的認識.....一

(一) 總理的遺志.....一

(二) 歷史的觀察.....三

(三) 地理的觀察.....五

(四) 政治的觀察.....一五

(五) 結論.....二五

二 附錄

(一) 龔德柏著·駁白眉初君「國都問題」.....二七

(二) 張其昀著·中國之國都問題.....五七

(三) 張其昀著·首都 in 國防上價值.....七五

(四) 仲 揆著·國防與北防.....八三

國都南京的認識 目錄

恪守 總理的遺教。關於國家政治中樞的國都地點，在革命勝利後，即成一重大問題。本黨於此，固察 總理或臨時大總統於南京的遺念，與死葬南京紫金山的遺囑，并考南京與國民革命的淵源，察其此後對於革命建設的影響，於是就毫不遲疑的決議定都南京，改北京爲北平，定告中外。凡是革命的或同情於革命的民衆，莫不體諒斯旨，異口同聲。奈外有帝國主義者的造謠，內有頑固或別有用心者的紛議，遂使中央遵守 總理遺志建都南京的意思，尙難得全體國民之瞭解。際茲奉安 總理在邇之時，誠恐愚妄之流，發爲荒誕之論，淆亂衷思，影響大典，爰輯斯編，以釋羣疑。

查年來國內學者關於國都問題的論著，據徵集所得，約有六七篇。其懷疑中央建都南京而主張選都北京者，計有二篇：

(1) 白眉初著：國都問題 (國聞週報五卷二十五期。)

(2) 葉叔富著：國都問題 (國聞週報五卷廿九期。)

見解既有偏執，立論遂多失當。其擁護中央建都南京之主張，或并駁斥異議者，計

有四篇：

(1) 魏德柏著：歐白眉初看國部問題（國聞週報五卷卅一，卅二期及新生命一

卷十號。）

(2) 張其鈞著：中國之國部問題（東方雜誌廿四卷九號。）

(3) 張其鈞著：首都之國防上價值（地理雜誌一卷二期及十七年八月上海時事

新報時論欄）。

(4) 仲揆著：國防與北防（現代評論八卷一百九十二期）

立論雖詳備瑣瑣互見，但大抵皆非充當。前者為本無糾正的對象，其文不錄；後者為本無宣傳的內容，彙而刊之。茲更為使閱者對於國部南京意識明瞭并觀念正確起見，特揭錄重要之點三，分述於本段之後。

(二) 歷史的觀察

歷史是人類以往生活的記錄。已往生活的記錄，固可作人類今後生活前進的參攷，

但不可作人類生活前進的軌道。因為革命的，有價值的人類生活，是要控制運命，不是要服從運命；是要創造歷史，不是要因襲歷史。自然的運命和已往的歷史，只可影響人類生活的一部，而不能束縛人類生活的全體。世界民族愈能做歷史上空前的事蹟的，愈能適於生存。白眉初君總舉數千年歷史的往事，斷定以北平為國都，則經久安而固，以南京為國都則短促偏而危。其筆力雖雄厚，其論據實薄弱。梁德柏君駁辯之文，針鋒相對，語多中肯。若更依上述革命的，有價值的人類生活必控制運命，創造歷史的觀念以言，則一切奴依歷史拘囿陳說之言論，不攻自破了。再就歷史上看，漢族在魏晉而後，北方民族，壓迫日甚，即為表示漢族力量的衰落。五胡而後，蒙元繼興，漢族力量，在摧殘蹂躪之餘，漸有進步；所以朱明起兵江淮，即能傾覆威鎮歐亞的蒙元，而奠都金陵。及滿清入關，漢族重罹災禍，在二百餘年之後，民族力量，始漸發揚光大，破歷史的成例，起革命於南方。發軔於洪秀全太平軍之役，完成於本黨總理領導之革命運動。倘依白君所認定歷史上居高臨下以北制南的成例，則國民革命軍當無必勝之望。所以民

族的盛衰存亡，實根於民族精神和力量的消長高下，中外史乘，班班可攷。更由近代史觀之，北平實為近世中華民族衰落的場所，亦可謂反革命勢力的巢穴；南京實為近世中華民族復興的紀念地，亦可稱為革命的國都。吾人為欲維持此民族精神於不墜，以為撲滅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之相互為虐計，則以南京為國都，適足以完成此重大的使命。

(三) 地理的觀察

地理是人類生活的根據，但人類的的生活！尤其是革命者的生活，是控制地理，不是依賴地理。控制地理，則地理之所有，多半成為人類生活的資料；依賴地理，則地理之所，多半成為人類生活的障礙。同是自然界之物，可以為禍患，可以為福利，專視人類之努力奮鬥而已。一部人類進化史，不過人類同地理自然界的鬭爭史而已。所以革命的，不價值的，進步的人類生活，總是勉力控制自然，不是甘心服從自然；總是勉力征服地理，不是降服地理。白眉初君所云：

「……然則宜於國都之地勢，有何原則否？曰有之，凡三：

國都南京的認識

六

(1) 應依據最固形勢，而躲避四戰之地。

(2) 應位於海疆上游，而具指揮全海之形。

(3) 應奠於全國上游，而有控制八方之概。

何言乎國都宜據最固之形勢也？國都對於全國為首部，亦為根部。根本動斯枝幹衰，頭腦亂則手足失措。京都震擾，全國顛危，此不易之理也。故定國都，必在最固形勢之下者，所以立萬世不拔之基也。何言乎國都應位於海疆上游也？世界競爭之點，今已在於海洋，故國都不宜處於內陸，而宜位於海濱。然不據海濱優勝地位，仍不足號召全海，而發揚國威，此今日國都，所以位於海疆上游也。何言乎國都應奠於全國上游也？首部冠全身，中央政府冠全國，若不覆冒乎高頂之上，則百體不隨意，萬方不應命。唯方向居上游，斯具俯視一切之概。地勢居上游，斯表高屋建瓴之觀。交通居上游，斯有六轡在手之樂。夫然後中央政府，統一全國之能力，始得以縱橫行使而無礙。……」

曰君本此三大原則，以批判北平與南京之價值，其謬重自然的形勢，輕視人類偉大的力量，竟至於此！考近代國家或民族之生存，多賴於國家或民族之實力，自然的地勢，所資倚恃者殊少。如謂優良地勢的國都為國家之根本，勿謂雄厚的民族力量為國家之根本。如謂國都應位於海疆上游，以號召全海，勿謂國家應有雄厚的海軍，以保障國家之獨立自由。如謂中央應設高頂之上，具俯視一切之概，勿寧謂中央建築於民意基礎之上，具統率全國之能。倘國猶是也，民猶是也，政治經濟文化甘於落伍，不求進取，雖有如何優良的形勢，也斷斷不能生存於現代的世界。準此以論，已足見白君昧於建國的時代觀念，徒拾陳腐言論以自榮，遂陷於絕大的謬妄。此三大原則既已不復適於今日；且欲據此以較衡南京與北平，才覺其愛憎好惡之見深，科學理論之根據弱，亦已由張君逐條批駁，白君又云：

「就中西歷史民族武力上觀之，大抵皆北勝於南，成爲慣例。如中國史，除元清兩代外，殆無一世，不受北族之擾。匈奴，柔然，突厥，蒙古。三尺童子，莫不知

之。秦起長城，漢重和親，三國統一於晉，晉避五胡而南遷，南遷被逼於北，卒統一於隋唐。唐代突厥，入居幾甸，而嫁公主於吐蕃。安祿山起兵盧龍，唐幾滅亡，而潞鎮之雄，獨讓河北。五代俯首事遼，既割燕雲，又創兒皇帝孫皇帝之醜號。而宋，遼，金，元之興亡，皆由北而南，盡出一轍。西洋歷史，埃及，希臘，馬其頓，羅馬，日耳曼，互相遞嬗，南歐北與，歷歷可數。故歷史慣例，民族武力，北勝於南。凡治史者，皆承認之。比其故果安在哉？要以氣候之影響為主因。

氣候者，人類之親切世界也。一種氣候之下，其民族之體方精神，隨之變異，歷歷不爽。大抵氣候寒冷之地，空氣乾燥，人身之血脈固聚，皮膚纖維緊束，則其體力必壯；物產少而生計艱，終日從事勞動奔走，其體力益健。氣候溫暖之地，水分豐富，人身之血脈浮動，皮膚纖維鬆懈，則其體力必弱；物產饒而生計裕，終日優游俯仰，出則乘舟，其體力益柔。故沙漠之民剝悍，山地之民堅強，大陸

之民剛健，水國之民柔弱。要之，皆氣候之所異也。故氣候寒地之民強氣候熱，地之民弱，此卽北勝於南之主因，無論何人皆承認之者也。今環攬北京之民族，西則秦隴，南則燕趙，東北則滿蒙，東南則徐淮。此等民族，受氣候之影響，而北京據乎其中，誠具雄武之氣象者也。

職是之故，今世強國之都城，皆萃於北緯四十度南北，或在北緯五六十度之間。其意云何？蓋北緯三十四度以南，尙屬亞熱帶，三十四度至四十五度間爲溫帶。四十五度至五十八度之間爲冷帶，五十八度至六十六度之間爲亞寒帶。今世強國都城，皆萃處於溫冷帶，亞寒帶之間。蓋居氣候寒冷之地，則民族強而精神健，一國首都之所資賴也。此卽北強南弱之主因也。茲列舉今世強國都城所佔緯度如下：

華盛頓

北緯三十八度三十二分

倫敦

北緯五十一度二十五分

國都南京的認識

柏林 北緯五十二度三十四分

巴黎 北緯四十八度五十三分

羅馬 北緯四十一度五十五分

莫斯科 北緯五十五度五十分

東京 北緯三十五度四十六分

北京 北緯四十度

右舉世界八大都城，最北者超過五十五度，最南者亦在三十五度以北。自北向南計之，北京居第五位；自南向北計之，北京居第三位。……』

所述氣候影響於人生之事實，吾人固不能不相當承認。（在仲揆君國防與北防一文，可以參證。）若德伯君與張其昀君所論，對於此點，確有忽略或迴避之嫌疑，茲不得不申其旨。前文已略述人類能力的限度。在繼續與自然奮鬥的過程中，的確仍不能脫離自然支配的勢力。積極上既無法克服，消極上就不得不有相當的禦防，以充實奮鬥的力

量。所以一個民族能得到獨立發展，不僅在乎有容易克服的地理環境，（即天惠之優越）使文風之繁茂。尤在於有堅忍剛毅忠樸耐苦之民族氣質，以克服艱難之地理環境。

總理所說：『要恢復民族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精神。』實不僅在發展民族之才智，尤在於培養民族豪邁剛毅偉大之氣質。才智固是革命成功的條件，但同時也是計較，畏縮，反革命的原因。魯特奮鬥，方為偉大民族性的表現，國家建設的基礎。優越的地理環境，雖為產生文化之所，但不易產生能犧牲的民族性。不良的地理環境，雖文化較難發展，但易養成能奮鬥的民族性。換言之，前者利於產生民族的文化，後者可以產生民族的武力。民族的文化與民族的武力，非互助不能共存，戴季陶先生曾論此旨云：

『……我們所最要曉得的，就是近代一百年來中國的革命運動，在中國歷史上，是開從古未有的先例。由開國以至於元末，幾千年當中，中國民族的移動，都是由北而南，而民族力的中心，都是在北方。只有明朝，是崛起於長江的下游，直向北方進攻，驅逐了蒙古朝廷，恢復中國民族的統治力。然而西江流域，從來沒

有發生過統一中國的力量。只有從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革命起，忽然由中國極南的廣東地方發生了一個革命建國的主力。總理所領導的三民主義革命運動，從種種歷史上的原因研究，都可以曉得的。的確是繼承太平天國的運動而起的。我研究中國的歷史，從民族文化的中心，分爲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是黃河流域時代。第二個時代，是長江流域時代，第三個時代，是珠江流域時代。再從產業上看：黃河的文化，是以農業爲主力而建築起來的。長江的文化是以工商業爲主力建築起來的。珠江流域的文化，是吸收現代歐洲的工業文明，以產業革命爲目的而前進的。從統治力的形成來說：黃河流域的文化，是進取的，創造的，生產的，征服的。長江流域的文化，是退守的，享樂的，消費的，被征服的。珠江流域在進行中的文化運動，是很明白地，繼承黃河流域的建國精神，只是在天候地理上，受了多少的限制，文化的實際力量依舊很小。今後的運動，我想是南北兩個創造能力結合，以長江爲調和中樞，而建設統一文化的時代。政治和軍事的能力。

，長江或者不如南北兩流域，然而由天候地理自然恩惠所培養出的長江的社會和
能力，的確是獨乎南北兩流域的。至於遠的將來，我想中華民族在建設世界的文
化上，最富於偉大而深沉的能力的，依舊是北方民族。在生物學的原則上，一個
種族的進化，常常要有比較身體強健戰鬥力豐富，而文化程度和系統不同的異民
族混血然後才能發生新的力量。當一個民族大混合的時候，或者他的文化，會沉
衰幾百年。但是這個沉衰，不是頹廢而是發育的暫時休止。長期沉寂，反足以引
起後來的特殊發展。歐洲昔格魯薩克遜和日耳曼民族的勃興，東方日本民族的發
展，却是很明顯的先例。

我們更要明白一個原則，就是一個民族的發展，必定是要從很大的戰鬥當中
得來，一個繁富的文化，他的前期，必定是很悲壯而激烈的戰史。自古到如今，
自中國到外國，只要是人類，決沒有不於戰爭而能發展的。試看現代所有一切文
明，那一樣不是由戰爭發展而來，人類最先發明的工具，就是戰鬥用的武器。最

先取得的食物，也是獲取而來的動物人們所享樂的。音樂，許多是武器的進化。和平。不。基。文。明。的。根。原，戰爭才是交戰的原動力，要時時不忘記這一個重大的歷史原則，才可以研究歷史，批評歷史。……」（見青年之路二十六——二十八頁）

根據戴先生的理論，我們更可以深刻的認識中華民族在發祥於黃河流域經過長江流域，而入於珠江流域的過程中，在黃河流域時代，文化與武力并茂，是能建築民族生存的基礎。及武力不勝異族之壓迫，迫而南遷長江流域，雖文化以天惠而日茂，武力遂以天惠而日弱。後來民族文化與武力逐漸發展於珠江流域，遂能完成本黨所領導之國民革命。是可知地理環境最優良之長江上海，乃民族武力最難保持之地。民族武力不能發展，民族文化就失其保障，適期其充分的發榮。所以今後民族發展的政策，實不容不作詳細的計劃，使南北人民在人口上，經濟上，政治上，教育上，相助以相濟，調和而同化，使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武力，得并茂於世界，則三民主義革命之目的方能美滿的實現。而欲完成此工作，并非國都所在地的問題，乃為政府之能否周詳顧及之問題。此種

地理上必然的關係，吾人豈不認爲人類之本分，却不能否認天然的限制，地理的實事。不過我們決不甘於屈服地理的。白君在前述國都原則，均爲人類已經克服之地理勢力，決不可猶畏以自卑。至後述氣候之影響，實爲人類尚未克服之地理勢力，自必須消極積極的抗衡也。若在三民主義的政治基礎鞏固以後，此種工作，必不爲民權的政府所忽視也。更依革命的意義觀之，建都南京，非唯不妨礙此偉大政策之進行，抑且爲實行此偉大政策的條件。至於列強國都，集於北緯四十度南北之說，南京在北緯三十二度，亦不得謂悖於此原則，其辯已詳於白君之作，茲無庸贅。

(四) 政治的觀察

關於建設三民主義的政治，必以(1)脫離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與(2)消除或防止貪官污吏的腐化爲第一步重大工作，而以(3)發展文化，提高民族創造能力爲最大目的。依此三點，而論中國之國都，則舊都北平之劣點殊多。第一，東交民巷使館區域，久成化外，平津險要，盡操外人，都城陳兵，最傷國體。內政外交，無論鉅細，悉受

操縱，更堪痛心。若都北平，直如在帝國主義者的樊籠，如何能便於打倒帝國主義工作的進行。第二，北平古都，久淪專制，封建餘孽，根深蒂固。近百年來，更爲貪官污吏的匯集場，藏垢納污的集中地。若在此等地方建都，廉潔政治的建設，真難如綠木以求魚也。第三，關於發展文化，全以前二者爲基礎。若在外有壓力，內藏腐穢的政治中，如何能產生充實偉大的文化？况自海道大通以來，中國文化中心，實萃於長江流域，爲便於發展文化，兼以領導華南華北學術平均之進步起見，則首都設於南京，實最爲適當。關於第一點，白君之謬見，已由陳君駁斥無遺。至葉叔衡君所云：

「北京受辛丑條約的拘束，有東交民巷使館界及從大沽到北京維持交通的外兵；這也是主讓遷都的一個重大理由。但東交民巷使館界，既是不平等條約裏的一小部份，當然是隨全部條約修改的。如說一時不能撤廢，則外艦的游弋長江，亦必一樣的不能禁止。外艦在下關要開砲或架砲示威，比東交民巷圍牆裏的架砲如何？恐怕用我國的破舊軍艦來阻擋外艦的游行，比用陸軍來阻擋京奉路上外兵的行

動，還要困難得多。……」

吾人於此，須明白北平與南京的地位，迥乎不同。北京使館的控制北京政府，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其布置的環境，已十分嚴密，操縱指使，已成習慣。南京臨江，帝國主義者雖可根據橫暴的內河航權，得有砲擊南京城的可能，但此種發行，乃非常的案件，彼雖窮凶極惡，亦不能隨時竊城，以爲平日外交威脅的利器。彼既無駕輕就熟壓迫我國中央政府的方便，我中央政府自有縱橫掉圜，使羣醜就範之可能。現在北京各國使館，因擾奪的特殊勢力，逐漸失其重要乃多有南遷就我京城的準備。如此賓主正位，民氣亦豪，其利於革命政府之外交的前途與內政的建設者殊大。其他關於南京在國防的價值，可細閱張其昀君論列之文。復次，葉君又云：

「日俄問題是我國外交上的最大的問題，也是我國的最大危險，爲對付日俄起見，首都在北京當然比在南京適宜。我們要知道我國地大而交通不便，人民未全脫部落思想；即在近來交通較爲便利的時候，也往往對於距離較遠處的事情，不大注

意，也不甚了解。……將來我國發展的方向在東北西北，危險也在鄂南方向。首都爲全國視線所集，如遷到東南一隅去。恐怕全國人心對於北方，便要弛懈了。

.....

帝國主義的壓迫，固然不限於北方，但是從海上來的祇是外交的經濟的壓迫，從西北東北兩方面來的，却更有侵略領土的野心，以及種族競爭之意義。所以從民族主義說，不可不注重東北與西北。其次就民生說，中國邊荒未闢，人民大都聚於十八省，因此民衆問題，人口問題已甚重大了。將來若不向北發展，祇有讓天災疫癘兵災去自然淘汰的一途。但是現在要消弭戰爭，要講建設，要重衛生，那便是更要造成人滿之患了。若要靠節育來救濟，那是要等五百年後方可叫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來使用節制生育的方法。倘如金陵大學所調查四千二百十六家農戶在民國十三年至十四年的平均增加率，中國人每年增加千分之一四·三，則過

七十年便加一倍，到民國一百年要有九萬萬幾千萬了。所幸東三省、新疆、蒙古的總面積，約合二百三十八萬英方里。比十八省的總面積一百五十餘萬英方里大得多。那裏可墾種的地也還不少，將來消納幾萬萬人，當不足為奇。以後我國經濟的發展，人口問題的解決，祇有此途。所以就民生主義說，也必須注重東北與西北。

大抵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發展，總是向着最可發展的方向去進取的。因此一國的發展政策往往有個方向，而為一國重心的國都，自須設在對這個方向容易進取的地方。……中國如採南進政策，首都應在南京；如採北進政策，首都應在北京。……中國百年大計既不在南進而在北進，首都的應在北京，當無疑義。……』

以上所論，我們認為是有個相當根據，不過日本的北進政策，俄國的東進政策，在革命的國民政府決不能不注意的，在本黨領導的革命同志和民衆，也決不會視聽備集中於首都，把北面的大敵，就忘到腦後的。關於抵制民族侵略，解決民生問題，我們相信

非先在較南的地方作充實或準備的工夫不可。所以建都南京，就是中華民族人口，經濟，文化，北進運動的條件。至於嚴刻的講來，一個民族的生機沒有恢復，中心力量，沒有充實，也談不到什麼南進北東進西進的政策。基本的工作還在集中全國的人才，集中全國的經濟，集中全國的工作，以求培育奮鬥的實力，而後所謂北進南進東進西進的政策，才能真實。我們認為革命的南京首都，是集中全國人才，經濟，工作的絕好的地點。換言之，我們認為復興中華民族的事業，南京的政治中心是容易完成其使命的。倘革命的政府，所作的事業，有不合革命的要求時，凡是革命的同志與民衆，都可以就一條一條的事體，指摘和糾正，這是革命同志與民衆的義務。但民權伸張，有其限度，不得過分，尤不得藉細故瑣事，即發搖動中央政府的惡意呼聲，使帝國主義者所竊笑。

關於第二點，白君云：

「或曰：南京為數百年帝都，風俗腐敗，良可慮也。初不知風俗隨人而移，周居關中，民風仁厚；秦居關中，民氣強悍；光武勵士風，郭泰為清流之音，東漢尚儒

術，桓榮揚稽古之光。今新新人物，類皆高樓亮節，雅度醇風，萃集國都，發揮其新學新政，則風行草偃，社會皆新矣。管寧居遼東，王守仁至龍場驛，學者雲集，風俗爲移。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國府居北京則北京立化爲新都，又何腐敗之足慮？」

葉君亦云：

「政治上第一件罪惡是貪污，中國政治的第一個大病，也在貪污。……民國以來，政府收入遠較前清爲多，而貪風亦更甚。……北京的有貪風并不是由於一人傑地靈」是從制度與習慣來的。這種制度與習慣，不是北京專利的，是全國一律的。現在要建設廉潔的政府，非從審計制度，收稅制度，及登用官吏制度上設法不可。收稅官吏不經手銀錢，納稅人還向銀行交款；審計用嚴格的事前監督制；官吏登用有定法，俸給足以養廉，養老有退休金——這幾種制度定了，祇要切實奉行，在南京也好，在北京也好，貪風自然會消滅。若不從制度上設法，莫說遷都遷到

南京，便遷到大戈壁去，遷到青海去，遷到帕米爾高原老祖宗家裏去，也不能使貪污絕迹。

貪污是政治腐敗的第一個特徵，其次是荒淫。民國以來，北京風氣日壞；近年有一班人的腐奢淫佚，俾盡作夜，尤爲以前所無。但這種風氣不是發源於北京，是摹倣上海的。……北京的社會，本來比南方樸實。北京雖是各省人物聚集的地方，終是在北方的社會裏，所以還未失質樸的氣味。比起上海來，北京真是個好地方。南京離上海却是近得多，在南京做事的，常可以到上海，況且南京本也是江南金粉地方，所以爲防止官吏的荒淫起見，北京的環境實比南京好。……』

總白葉二君之意見，以爲風俗的腐敗，政治的貪污，皆係於制度與習慣。而制度與習慣的不良，乃普徧的；革除之法，端在乎領袖之爲人。於此吾人第一須知古今國情的不同。古時的國際關係簡單，敵人除暴力的侵略外，他無所長，所以祇要有勇武的君主外禦胡虜，就可以對內發揚文治，建立新制度新習慣了。并因爲當時異族文化的低下，

所以我族哲人賢士，很容易德化一方，移風易俗。現在却不同了，國際關係複雜起來，敵人之侵略，兼武力，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而有之。被壓迫被侵略的國家，中央政府若在他们肘腋之下，很難建設民族獨立自由的制度的。他們在北平握着優越的特權，直接間接的可以摧殘我國政治的新生機使新的制度，不能實現；使官僚政客，多所保障；使革命的力量，低降分散；使封建的勢力，繼續延長，以達到其乘火打劫瓜分中國的目的。所以帝國主義者終天希望並積極運動我們政府北遷，以便入其圈套，我們既已窺破奸謀，決無北遷都城，甘願上當的道理。政治問題，不能解決，一切文化改造事業，必致勞而無功，這是許多經驗和事實告訴我們，不能不注意的。關於這點，前節業已詳述。至於貪污之風，南北一律；荒污之習，滬為淵藪之說，是固略有是處。不過貪污之風，雖流毒於全國，實倡源於封建勢力中心的北平；荒淫之習，上海雖為淵藪，究遠離乎首都。建設廉潔的制度，南京究較容易；防止金粉文化的滋蔓，已收成效。（如首都禁娼，實際雖不能全濫裁機，但成效日著。）倘政府執政之人，果仍流於貪污荒淫的惡習

，則本黨領導之革命勢力，決不能任其存在於青天白日之下。所以只要集中民意於本黨指揮之下，必可防止磨機於未長之前。國都南京，非唯容易建立廉潔有爲的中央政府，更可以使北平成爲廉潔進步的北方重鎮。這也是必然的結果。

關於第三點，我們認爲國都固不必是一國學術的中心，或文化的中心，但國都確是一國學術發展文化進步的原動力所在地。中國的幅員既如此其廣大，要想建立文化或學術的中心，決不能集中於一隅，至少要使全國有三個發展文化或學術的中心，或重鎮。由北數起，第一是北平，第二是南京，第三是廣州。要想把中華民族從根本上救起來，那就非積極的把這三個發展文化的中心建設起來以迎頭趕上世界的文化不可不把內地的文化發展起來，不把內地的民族創造能力恢復起來，一定不配妄談發展邊疆，充實國防的問題。要想完成這種工作，其推行的原動力確有位於南京爲最宜。因爲在北平建都，姑不論其在帝國主義者鎖鍊之下，封建餘孽蠶集之場，決不能產生政治的作用，即便有幾分推動文化進步的力量，亦對於長江以南各省有鞭長莫及之憾，較之革命之南京

爲國都，減少列強與封建餘孽的壓力，易於產生政治的力量，并臨近與世界交通之上海而有居中指揮南北文化并進之便利者，實有天淵之別。關於此旨，前錄戴先生文中所論以長江爲調和南北兩個創造能力之中樞而建立統一的文化，當更見其精當。

(五) 結論

總結以上所述，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其理由有四：

(1) 總理指定南京爲首都，臨時政府就任於此，臨終遺囑陵墓於此。所以建都南京是遵照 總理的遺志。

(2) 從歷史上看，北平是近代中華民族衰落的中心場，南京是近世中華民族復興的紀念地，所以革命的國民政府建都於革命的南京乃是適合於革命的需要。

(3) 從地理上看，南京是控制地理環境，統治全國，復興中華民族的最適當的政治中心，北平是失了時代性的地理優勢。所以建都南京是鞏固革命政府基礎，完成南北調劑，移民實邊，抵禦侵略的條件。

(4) 從政治上，南京是脫離帝國主義封建餘孽的壓迫和摧殘，並致力革命的建設，發展民族文化創造能力的最適當的首都，北平是帝國主義者及封建餘孽危害黨國的陷阱，民族文化發展的障礙。所以建都南京是建設革命政治的條件。

準此四點，論其核心，曰創造，曰革命，曰人定勝天，曰事在人為。倘秉此意細閱以後各篇論文，當可觀念正確，恍然於本黨政府建都南京的徵旨，則疑霧頓消，共同努力，黨國幸甚。至於建設首都之經費，雖所費頗多，但為革命的建設，其價值較之表現或喚起帝王思想之北平建築，實不可以道里計。且建設經費，原議分省負擔，陸續籌撥，計劃雖具，實施尙待將來。况建築愈宏，災民之容納愈衆，荷畚而來，鼓腹以去，較之計口授食，費鉅而效寡者，其價值奚啻天淵。倘有如此一類之杞慮者，可以休矣！

一 附錄

(一) 駁白眉初君『國都問題』

梁德和

——載國聞週報五卷三十一二兩期——

白眉初君最近有論國都問題一文，載諸國聞週報第五卷，二十五號，極力主張南京不宜建都，中華民國億萬斯年之國都，非北京（姑依白君仍舊稱）莫屬，文中援引歷史地理，如數家珍，筆文之雄偉，亦足稱是。吾人對於作者苦心亦表相當敬意。惟吾人所遺憾者，白君對於近代國都之意義，毫無了解。故以十八世紀以前之國都論，而欲適用於現代，根本上已屬錯誤。惟此在本文之外，容俟他日暇時，再論現代之國都，以求教於白君。茲姑就白君之文論之，吾人亦不能不深懷疑竇。

蓋白君所引用者完全爲利於北京而不利於南京之歷史地理，其利於南京而不利於北京者，白君皆避而不言。似不能謂爲公允。尤以最後論『列強之侵略』及『使館保衛界』

國都南京的認識

之糾纏」兩段，與日人所希望者如出一轍。吾人不敢以不肖之心待人，然仍不得不疑白君之議論，或係有所爲而發，似非完全爲國都而論國都也。蓋能援引歷史地理之白君，不應對於國際情形，隔閡若此，吾人對之，未便錢默。特爲逐條駁辯如次。此蓋吾兩人學理上之研究，對於國都問題，當不致生若何影響。蓋南京建都，已係既定之局勢，決不爲書生一兩篇文字所左右也。

一 歷史之觀察

白君指陳歷代國都，上古中古多在長安洛陽，近古近世多在北京。自高宗南渡（一二七）迄於今日，（一九二八）北京建都者凡八百五十七年，且皆「經久安而固」。至於南京，自六朝經南唐朱明，迄於洪楊，建都年數，不過四百四十三年，且皆「短促偏而危」，除朱明五十三年外，皆非正統云云。以上所述，皆歷史上之事實，吾無以駁之。惟吾人所欲研究者，從來建都北京者，若遼若金若元若成祖以後之朱明，若滿清，豈因北京適於建都而強盛耶？抑本來強盛，而北京偶因其建都，遂得歷史上

「經久安而固」之國都之美名耶？然而歷史所證明者果何如。固係後者而非前者，此蓋人所知也。蓋遼起自鹽潢，時會中原五代之亂，武力之雄，冠絕當世。即使石晉不割燕雲十六州，然依自然之脹膨，亦終能力征經營而取之。既得燕雲，常慮中原之復取之也。故舉國以爭之，營南京於燕，西京於大同，以爲久假不歸之計。是遼之力，足以取燕雲而守之，非得燕雲而始強也。故迄女真東興，中原同始終無力以爭燕雲也。不特不能爭燕雲，卽削弱不能立國之北漢，以方興之宋，竭太祖太宗兩代之力，僅乃滅之。是遼能有燕雲，遂強宋弱之所致也。女真起自會前，西向擅有中夏，仍遼之舊，建爲都邑。內顧根本，外臨河濟，乘其方興之勢，滅遼促宋。是金之盛，亦有致盛之原因，非得北京而始盛也。使北京果爲萬世不拔之國都，則遼可以不亡，而金可以不興也。蒙古起自和林，混一歐亞。武力之盛，亙古罕有，其都燕京，亦不過仍遼金故事，非都北京而始強也。其後政教不修，不百年而爲朱明所驅除。以元代兵威之盛，其情性亦足支持百年或數十年，是元之都燕，固亦無補于滅亡也。明成祖以祖潛而集靖難之勳，或者以燕似

優於金陵也。然成祖爲蓋世人傑，惠帝決非其敵。假令太祖建都於燕，而以金陵封王成祖，靖難之師，亦不難由南長驅入燕。如徐達富遇春滅元故事。此亦不容疑者也。成祖靖難之功既成，因當時蒙古之餘裔猶熾，習見燕都之宮闕市朝，不無窺伺之情，故切切焉以北顧爲慮，遂建行宮於燕，因而整戈秣馬，回征弗庭，皇輿巡幸，勞費實繁。易世而後，不復南遷。此建都所以存燕也。然其子孫政教不修，日就削弱，幸當時東胡未興，故得延其宗祀至二百年之久，使愛清覺羅氏早興百年或百數十年，則明社之屋，亦必因之提早。是明之都燕亦無補於滅亡也。滿清仍明之舊，建都北京，其年代最久者，則係英主輩出。加以政治組織，頗爲得宜，故雖經漢民叛變度之反抗，仍得安然無事。及其晚年，政教不修，武昌義旗一舉，不費吹灰之力，而清社遂屋。同一建都北京，何前後強弱相差至於如是耶？蓋其前之強，由於英主，其後之亡，由于失政。以清康熙之英武蓋世，建都北京，固足以侵略華夏，傍及蒙回。即使建都南京，其武功亦不固之稍減。此則治歷史者所當承認者也。試觀民國十七年間，北京已六易其主，除袁世凱段祺瑞

二人外，殆無一能經過二年者。豈北京之形勝僅利於遼金元明清，而不利於民國耶？蓋亦強弱異形，政教異類之所致也。且北京之建都，不備自遼金始，不過由遼金以來，始有燕京之名耳，春秋時北燕之郡，卽今之北京。其後併有衛州，遂遷都焉。然去今之北京僅二百里耳。燕在春秋戰中國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其後秦人滅趙，敗燕軍於易水之西，而燕亡矣。漢封威崇虞館於燕，不旋踵而敗滅。雖借匈奴之勢，亦不能爲漢害。彭寵以漁陽賈禍，公孫瓚以易京覆宗，王浚奄有幽州，幸晉室多故，冀以自雄，而見戕於石勒。毘匹碑有幽州而仍不能自立，杜洛周葛榮韓嬰之輩，旋起旋滅，皆不足道。高開竊有漁陽，身死而地歸於唐。安祿山以漁陽叛，雖得兩京，而卒不免於敗亡。天寶以後，藩鎮以河北叛亂者，凡十七起，其能免於誅戮，保其宗祀者，不數見也。迄夫李匡籌見滅於克用，劉守光繫組於存勗，而幽燕卒併於河東矣。由此觀之，燕京及其附近之地，烏在其爲萬世不沒之基業歟？至於南京，雖如白晉所云，「短促而危」也。然試觀其致此之原因。則亦不能歸罪于建都之不良，蓋當三國鼎立之時，吳最弱，又敵

值人傑，衆寡懸殊，宜聯巴蜀以圖中原。然孫權識量短小，甘中曹操奸計，襲取荊州，而吳蜀稱兵，魏一役，兩敗俱傷矣。故終魏之世，吳人不能得志於中原，人謀不臧，於地何尤？然曹操臨江而敗，曹丕臨江而歎，魏師之敗挫於吳者亦屢矣。雖不能進取，然亦足以自保。及至孫皓失政，自取滅亡，雖無「王濬樓船下益州」，而「金陵王氣」亦不能不「黯然收」矣。以孫浩之昏庸失政，若都燕京即可免於滅亡，則慕容之暴，可以子孫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矣。至於東晉，承懷愍之後，內有蘇峻王敦之叛，外當五胡豪傑之強，然祖逖擊楫渡江。而咸行河朔，雖以石勒之雄，不能不暫避其鋒。符堅以百萬之衆，長驅而南，堅之意以爲力既足以東滅燕，西併涼，北舉代，隔區殘敵之晉，其足以攫其鋒哉？然謝玄輩二三「不經少年」，率八萬之衆拒之，淝水一戰，風聲鶴唳，皆爲晉兵。堅雖不亡於晉，而已亡於伐晉之日矣。桓溫內懷篡逆之心，國人不服久矣。然覆李勢於西川，震符健於灊上。走姚襄於洛陽，逼慕容於枋頭，可謂赫然振拔矣。使不驕蹇自用，則慕容之滅亡，不待於王景略之東征，朱明之功業，不難早見。

於東晉之世。惟其心懷篡逆，無意收復關中河內，遂使中原衣冠，再左衽二百餘年。人謀之不臧，豈建都建康之過耶？劉裕篡除桓元，收復荆楚，北平廣固，西定梁益，乃經營河洛，規取關中，以拓跋之強，濱河鎮戍，亦斂息而避其鋒，卒能擒姚泓於長安，遂使關中父老，復見中原衣冠。使裕果能用王鎮惡之才，而資以關中之地，則收復幽燕，混一華夏，未必不能。惜裕志在篡逆，不肯授鎮惡以霸王之資。故擄貳其權，隱授沈田子以殺鎮惡之計。鎮惡死而關中束手歸於赫連矣。人謀不臧，孰謂建都江南不足以有爲也？夫混一天下之機會本少，然東晉百年間，兩度遇之。皆以常局者無此大志，卒兩失之。以此而歸罪建都江南，恐江南不任其咎也。劉氏篡晉，禍變屢起，遂使北虜坐大，不復能淮隴泗而問鼎中原。蕭齊以後，篡弒頻仍，昏主迭出，自保不暇，遂使韓擒虎飛渡天塹，而天下遂併入於隋矣。楊吳南唐，本非周宋之敵，然校列國爲後亡。五代亂後，破混一於宋者多矣，豈皆建都江南之故歟？亦以強弱異勢也。朱明奮起金陵，混一天下。打破千餘年歷史公例，爲建都金陵者吐萬丈氣焰。惠帝之見逐，蓋由於才不及

成祖而欲批逆鱗以遂其怒，其無幸免也宜矣。使惠帝與成祖易地而居，惠帝亦終失敗，前已述之矣。蓋人才優劣之關係，非地勢優劣之關係也。洪楊致敗之由，紙不勝書。託名耶教一也。君臣儉安二也。內訌迭起三也。得地而不守四也。革命而不愛民五也。加以左李胡彭楊皆係人傑。主信於上，臣奮於下。以保護佛儒相號召，而人心全去洪楊矣。金陵有石達開李秀成之才，而不能信任。一則流離顛沛，一則左支右絀，即使建都長安，亦不能與覺羅氏爭一日之長短明也。降至今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去歲長驅北伐，淮泗之地，已入掌握，規復魯燕在指顧間。雖不幸寧漢分裂，中途偶挫，然本年再舉，遂不兩月而收復燕京矣。成功之速，為數千年所未有。吾人觀察其成敗之跡，完全係於政治之隆替，人才之優劣，於地勢固無關係也。建都金陵，既可一再北上，而統一中國，數千年歷史中，僅北人能南下之公例，以證明其虛偽。則從來視為「短促偏而危」之金陵。孰能證其不由此而變為「經久安而固」之中華民國億萬斯年之國都歟？故就從來之歷史證之，白君之推崇北京，故抑南京，可謂一偏之見，非通論也。

二 地勢之評判

白君論國都地勢，宜合於左之三種原則：

- (1) 應依據巖岡形勢，而躲避四戰之地。
- (2) 應位於海疆上游，而具指揮全海之形。
- (3) 應處於全國上游，而有控制八方之概。

此三者，僅偏於舊式國防見地，未能包容現代首都之全意義，姑不具論。即依此而論，北京亦無優於南京之處。姑就白君所論，特爲辯駁如左：

(一) 評判北京之地勢

(A) 白君歷舉北京有長城之固，陰山太行之險，渤海之限，謂爲天造地設之一防衛地帶。故北京形勢爲優云云。吾人讀此，不禁失笑。蓋今日欲以武力侵略中國者非復阿奴突厥。對於東來之武力而誇西北之險固，可謂冠屣倒置。白君此種議論，若發表於數百年前，不無一顯之價值，而在今日，有時代落伍之譏。蓋渤海海口之旅順大連，既

爲日人所掌握，而威海衛亦爲英人所佔據。大沽口之砲台既毀而由海口達北京之防禦盡撤，且禁復修，北京早暴露與外兵控制之下。今試假使外人由大沽進兵，吾人果有何術利用長城陰山瀚海而當外兵入京之路乎？由沽至京數百里間之六平原，非白君所謂『四戰之地』乎？白君主張建都北京，欲『躲避四戰之地』，其事實上適爲選擇『四戰之地』而甘處重圍之中而已。天下至滑之事，莫有如此者！試觀英法聯軍之役。（西一八六〇年）咸豐何以蒙塵熱河？八國聯軍之役，（一九〇〇年）百君何以遠避西安？區區四十年間，北京已兩度爲外族佔領，而百君尚儼然以『康固之形勢』，『萬世之基業』，誇示於人，乃爲讀者所竊笑歎！

（B）白君謂『北京位於海疆頭部上，外具深太平洋根據之勢，內現指揮全海之形』云云。此亦自畫自贊，非平心之論。蓋中國海岸線，能『延長一萬三千餘里』，渤海適在其北，由大沽口，南達北碭河口，不下九千餘里，即以現代航行力最大之汽船行，由北達南，亦須七日之程。若云便於控制全海疆，北京適見其偪而不適。不知白君

果有何術以「內現指揮全海之形」也。至於揚子江之蘇大感，既為日英所分據，則渤海形勢上已不能完全為中國所有。而況大沽至天津一段水程，僅二千噸以下之小船，始可勉強通航。故外海大汽船，皆止於上海，而直達渤海海面者，已寥寥觀。至航入大沽口者，可稱絕無。以如此不適於外海運輸之大沽港，不知白君果有何術以「外具操太平洋霸權之勢」乎？故我敢謂白君所論，皆欺人之言，不足為讀者道也。

(C) 白君謂本部十八省中，臨海而又東北居全國上游者，其惟北京。實為初聞。上游云云；當依河流立論，如指洛陽成都，則尚有可說。白河與中國巨流殊難比論，且臨海與上游、白君而外，恐無聯用者，即就所論，然吾以為同一中華民國領域，「本部」與非本部之區別，絕無必要。若就全中國領域觀之。東北而又臨海居上游者，當莫過於奉天。以白君之原則言之，則中華民國之國都，應在奉天。何以白君不主張最東北最上游之奉天，而主張次東北次上游之北京乎？毋亦曰奉天有特別原因，不足以為國都。然則北京亦非無特別原因。何以不宜棄之不都，而勞白君之大發議論乎？此非吾人所能了

解者也。白君又謂『就中西歷史民族武力上觀之，大抵皆北勝於南，除元清兩代外，殆無一世不受北族之擾』。是誠非虛。然北族侵擾中國之歷史，迄愛新覺羅氏滅亡，已告一大結束。所謂『匈奴，柔然，突厥，蒙古。』或已消滅，或已遷徙，或已同化，而僅能保其殘喘者，惟蒙古族而已。然今昔異勢，蒙古民族復興，正賴我漢人之共存互助，當不至如鐵木真忽必烈之率其種族以欺凌漢族。今日論首都尤無此顧慮。則吾人留都北京以鎮壓之，可謂無的放矢。且適與人挑撥漢蒙感情之口實，則適足以增紛擾耳。善治國者所不取也。

白君舉英美德法意俄日諸國國都，皆在北緯三十五度以北，以爲中國應在北緯四十五度之北京建都根據。是亦牽強附會之詞，苟如此則南美諸獨立國，非向北美借地僑置，無可建都矣。豈非怪論！且上舉諸國，或國土褊小，北緯三十五度以南，已無領域。若英若法若德若意皆是也。（專指本土，殖民地不在其內）而美之建都華盛頓者，則以建國之初，領域惟東北十三州，而華盛頓最爲適中。其後領域漸膨脹，遂成偏東北之勢，

非於建國之初，先就如白君所舉之三種原則，研究某地適於居高臨下，始定爲國都也。日本則東京爲其江戶古都，且較適中。故明治維新之初遂遷都於此。至於俄國，近且棄其偏北之列甯格勒，而遷於適中之舊都莫斯科矣。中國之棄北京而定都南京者，亦以較爲適中便利耳。且南京亦在北緯三十二度以北，去白君所懸爲適宜點之三十五度，只差三度耳。若差三度，卽謂其無建都資格，甯非更奇！若以其所舉標準，有三度之差，卽強弱所係，恐白君爲新風水大家，別有發明。否則，非吾淺識所能測矣！可知都城之南北，與強弱毫無關係也。

白君又謂「北京居陰山尾部環拱之曲中，而臨中國第一平原之北端，具指揮八方之概」。考中國山脈，約分三大幹，陰山，北嶺，南嶺是也。陰山山脈，則偏於北，南嶺山脈，則偏於南，求其真能「具指揮八方之概」者，惟北嶺耳。而在純粹陸上爭雄時代之中國古都長安，則適居其要害，張衡西京賦所謂終南太一，隆嵒崔嵬者是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從河隴以東，商落以西，厥壤肥饒。古稱沃野千里，天府雄國，誠不愧

爲中國數千年之雄都。是故從來由關中而統一河洛者續者多，由燕趙而統一關中者少，地勢使然也。昔專以山勢比擬，則長安爲優，北京仍自望堪莫及之概，再就平原論之，中國全國稱爲平原者，凡十有六。燕，趙，魏，齊，魯，宋，鄭，衛，許，蔡，陳，蔡，吳，越，楚，秦，蜀，廣，東，松，遼，塔，里，木，燕，湖，紹，興，溫，州，滄，州，朔，平，水，河，套，大，理，諸，平，原，是，也。卽如白君所論，北京前臨滄，淮，平，原，與其他十有五之平原，固無關係也。孰若長安位於渭，水，平，原，而臨，淮，運，背，負，崑，崙，山，左，河，套，右，成，都，而，其，他，之，平，原，亦在指揮掌握之中。由舊觀念言之，北京亦非絕優也。然則自君何以主張建都，動，勢，最，優，之，長，安，而主張不如之北京耶？若以長安有特別原因，不合國都資格，然則北京亦非無特別原因，自君以爲仍不失其國都資格乎？他日滄，海，同，成，諸，路，告，成，若有人主張以長安，建，都，法，成，周，漢，唐，之，故，事。據「指揮八方之形勢」，或未嘗無一顧之價值。而自君對於堂，奧，洞，開，藩，廳，盡，撤，臥，榻，之，側，強，盜，橫，行，之，北，京，不，惜，輿，敗，費，財，至，引，山，勢，平，原，欲，以，圖，其，說，卒，不，免，捉，襟，肘，見，果，何，爲，耶？

白君又謂北京有『滿洲大路，蒙古沙漠路，瀋陽玉門路，綏路，東南平原路』，以爲『足以控制全國』，此則可謂時代錯誤，已達極點。以鐵路飛機發達之今日，尙欲恃數千年來毫未改良之驛路，以統治其國家，已爲讀者所笑，况以驛路爲標準，北京亦不適中，試問蒙古沙漠路，何以不能制外蒙之獨立。瀋陽玉門路，何以不能免新疆之阻隔？綏路何以不能免康藏之跋扈。可知此種遺物，於近世之國防上交通上，無大價值。至於滿洲大路，及東南平原路，已大半改變鐵路，誠不失爲交通利器。然今日交通工具大非昔比，北京能利用之，南京亦能利用之。南京不獨水路較北京爲便，卽就東三省而言之，浦口直達天津，特別快車，不過二十五小時。若直達奉天則南京去東三省較北京遜不及一晝夜。就國防言，北方自另設軍區與首都無關也。且北美合衆國由華盛頓而達西部海岸，有在八十小時之上者，又將如何？是白君所舉北京交通之便，亦不過諉詞耳。

(二) 評判南京之地勢

(A) 白君謂『古人稱南京形勢甲東南，皆就其附近狹小之形勢之言也，苟合大江

南北百里內外觀之，則一平原四戰之區耳。茲舉宋朝安國，李綱，陳楚先之言爲證，斷定『采石磯爲南京亡國之門戶』。此特就宋明以前之情勢而言也。南京附近之地域，雖不能謂爲絕對險固，然吳淞砲台及海口防禦，大可改修，不如大沽之受條約限制。（廢約爲另一問題）至論從前割據之局，江南得勢之例亦不少。然非所論今日大一統之中國。白君指『采石磯爲南京亡國之門戶』，其心目中似尚有江北或上游之敵人存在，可謂時代觀念錯誤已極。蓋今後敵人在外而不在內。東方海疆重要，前已述之矣。對於外來之敵人，而論南京上游之是否險固，其謬誤與論北京，而恃西北長城陰山瀚海之險正同。以白君之明，何顛倒若此耶？白君爲自圓其說，而爲此本末倒置之議論，誠難索解。無論如何，南京對於海通敵人，較之堂奧洞開，敵已深入之北京，畢竟此善於彼。

（B）白君謂『江蘇海岸，概屬沙岸，吳淞口雖有砲台，然砂平水淺，毫無軍港價值，豈唯不能外攻，抑且不能內守，故有鴉片戰爭南京城下之盟』，云云。夫南京雖非據海疆上游，然據海疆中樞，『構成繫中則首尾應之形勢』，白君已承認之矣，特白君以

海港不良，故貶其價值耳。夫良不良，不過比較之辭，今試舉江蘇海岸與渤海海岸而比較之。吳淞口之「有砲台」，豈不勝於大沽口之「無」乎？旅大威海，雖係良港，然在外人佔據之下，不能爲我所用，反資敵用，而「砂平水淺之吳淞港」，仍屬中華民國主權，大有增修餘地，况舟山列島，爲良好海軍根據地，外人早經調查，垂涎已久。將來整與海軍，未嘗不可以此爲根據地。安得謂爲無控制南北之能力也。至狼山君山蕉金諸道鎖鑰，卽假定其現在毫無防禦能力，然較之由大沽至北京數百里間，不許設防者，寧不較勝一籌哉？况此等要害地點，主權既未受限制，則今日之無防禦能力者，焉知他日不變爲銅牆鐵壁也。南京雖有英人衝入之歷史，然較之北京已兩度攻破常駐外兵者，其安危又何如也？總之，白君有意推崇北京，貶抑南京而處處皆露馬脚。况上海爲全國最大商港，長江爲全國最大河流，海陸交通，無不便利，將來建設完成，恐除英京倫敦外，非其他大國京城所能望其項背矣。

(C) 白君謂「南京爲低平原，爲邱陸地，爲一羣湖包繞之都會，非據全國上游之

形勢」。此亦吹毛求疵，不論現代都會主義之偏也。若世界各大國都城，偏南而又底下者，莫倫敦若也。若就白君所持理論言之，則蘇格蘭建都於蘇格蘭之巔，方足以云據上游，非低地。然宋曾問英人有此統也。南京偏海不遠，其低則與倫敦大略相似，使此後經營得宜，則安知他日不為東洋之倫敦乎？吾人以為建都南京祇問其是否有世界性，且合於現在國都之觀念，則低地可，羣湖包繞亦無不可。若白君以為非據上游，不能控制全國，則是白君心目中嘗有一北南分離，或上下游分離之部署觀念，並未認識中國已達大統一之境。再退一步言之，即假定他日揚子江以北或上游有叛逆者割據。然而南京亦非居於劣敗之地位。以南京而控制北岸或上游之事實，紙不勝書。遠之如劉裕之滅南燕，岳飛之伐金，朱明之統一。近之如由寧北伐，及西征武漢，皆其例證，况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猶昔也。夫南京對內既如此，對外又如彼，「低平原」云乎？「羣湖包繞之都會」云乎？皆不足以損其建都價值之毫末也。

白君又謂江南「山水明秀，風景絕佳」，易流於文弱，如陳後主，南唐李璟，皆以

文弱荒淫而亡其國。此亦陳腐之語，不合於現在者也。蓋當六朝之末，江南日趨開發，以平城洛陽較之，誠屬不如。然現在南京則久經廢棄，以遠不如從來之繁華，而北京經八百餘年之建都，積存淫靡之習，浸淫已久，牢不可拔，轉不如南京之氣象一新，舊習皆泯。如白君所誇示於人之中央公園體育場，三貝子花園等等，居北京者每日多放棄其職務，而宴樂於此。若論荒於淫樂，則今日之北京，實較南京爲甚。此證之曾旅居兩京之人士，皆樂北京而惡南京，而近年來凡訪有北京之軍閥官僚政客，無不腐化者，蓋亦以此也。白君不顧現在情勢，而引千餘年前之六代豪華以爲病，實非平心之論也。

白君又謂南京之交通，「僅利於東南，而不利於西北」。此論吾人亦不敢贊成，蓋萬里長江，下起上海，上迄重慶，皆通輪航，若鐵路亦可沿滬寧沿江而達上游。北有津浦，南通閩浙，他日甯湘浦信諸鐵路告成，（本句應改爲總理鐵道計劃實現。）——緬者）則東西南北，無往不利。謂必劣於河北之北京，其誰信之？

白君又謂「南京建都多偏安而年促者，在恃長江以爲天險，不修政治」。異哉！白

君之言也。白君大著洋洋萬言，皆誇北京之慶固，而特爲萬世不拔之基。是自君固欲恃險以立國也。忽乃對於南京之長江天險，則視爲亡國之根源。同一險也，在北京則極力誇之，在南京則極力貶之。自相矛盾，一至於此，是何故耶？

三 外侮之抵禦

(A) 列強之侵略

(甲) 「日本」

建都北京，對於日本侵略，如何抵禦，吾人讀白君大著至此，滿望其有高明之意見發表。不幸白君祇有遁詞謂「政府在北京，具有臥榻之側，未容他人酣睡之勢，日本不能無所顧忌。一旦政府遷居南京，……而渤海之涯，頓行鬆放，南滿疆域將非我有也。……以遷都南京，而惹滿洲屬日之大禍，則主持之人，萬世不能洗其污點，而逃億萬人之唾罵也」。奇哉！白君之言也！日本垂涎滿洲，誠如白君所指摘，或且尤甚。然日本之併吞滿洲與否，完全係於現在國際關係，及將來我國實力，苟國際間形勢大變，英美

俄諸國若爲日擊破而我國又無力與抗，則日本之併吞滿洲，自不躊躇。而與中國之建都北京抑都南京，毫無關係。或且因建都北京，日本可以直接威脅中國國都之故，對於滿洲更爲垂涎，則在意料之中。若謂日本之不敢併吞滿洲係因中國以滿洲爲「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酣睡」所致，則三尺之童，當亦笑其謬妄也。至遷都南京，縱不能阻止日本對滿洲之垂涎，然至少亦可減日本對於首都之威脅，試更申言之，以開白君之惑。民國四年，日本對我國提出所謂二十一條要求，發哀的美敦書之當時，對日本國內軍隊，只下兩師團動員令，日本竟敢於如此輕侮中國者，實其平時駐京津軍隊，早已控制中國首都之生命也。若中國仍建都北京，其危險與二十一條要求時毫無變更。從前所賴以直接防禦其國都者，有大沽砲台，及海灣至北京間一切防禦的設備；所賴以爲間接的防禦者，東北有滿洲之屏蔽，大連旅順之良港，東南有山東之屏蔽，膠州威海之良港。然自辛丑之北京和約，因一部拳匪之錯誤，而不許吾人有自衛其國都之權利，撤廢大沽砲台，及北京至海濱之一切防禦設備，遂令我國都陷於無防禦之悲境。而東北屏蔽之滿洲，被

日本以大軍駐屯要地，大連旅順，屯強大之海軍，築堅固之要塞。東南屏蔽之山東，現猶在日本大軍佔領之下，即令在最近將來，日本有撤兵之可能，然彼苟有佔領之必要時，不難朝發夕至。且京奉鐵路，北京東北交通惟一之要線也。平時以爲日本三千以上之軍隊，（現在已臨時增加七八千之兵力），節節分屯，扼要駐守，而北京之日本公使館，設有衛隊。豐台，黃村，宛房，楊村，天津，塘沽，北塘，灤州，昌黎，北戴河，湯河，秦皇島，山海關，錦縣，新民等地，日士又各設有大小守備隊，及分遣隊，以與南滿之日本駐屯軍相聯絡，其中毫無間斷。此北京在平時即被日本佔領之實狀也。夫以已經被人佔領之北京，而必謂優於南京，如爲外人欲驅中國入彀，則猶可說，白君華人，而有此怪論，其心何居，非所敢問矣。日本之所以長欲保持此種軍隊屯駐者，即欲令我國長處於甲午喪師，庚子被屈之地位，而從得長保其戰勝者征服者之態度以凌我。故其二十餘年來對我國之外交，惟有一種強硬之命令的外交，毫無平等協議的外交。與我所締之約，但有城下之盟，毫無合意之約。固不必每事動兵，不必每事皆發最後通牒，僅以

北京附近所駐之日本軍隊，已足爲外交上絕大的武力威嚇故也。若中國願年年歲歲爲戰敗國，受城下盟，則北京誠爲唯一適宜之國都。若思稍自振作，不甘忍受此種屈辱威脅，則棄北京而另建新都，亦爲釜底抽薪之計，並使京津失其駐兵之根據，在今日實較爲得計。夫君士但丁，地跨歐亞非三大洲，爲世界第一優良建都地。然土耳其以其受列強壓迫，甯棄之而遷於與海隔絕之安卡拉。夫君士但丁之受壓迫，固非平時即在各國佔領之下如北京也，而君士但丁之險固，又非堂奧海關，絕無防禦之北京可比也。然而土人棄其故都如敝屣，不稍顧惜，而土耳其之國勢，反如旭日東昇。豈亦如白君所謂，「因一時之便利，一部之感情，偶然之安全，少數人之觀察，……兒戲以奠定之，終陷國疆國運於危急存亡之下」耶？此則如白君之主張建都北京者，乃有此病。

白君對於吾言，或將謂「南京城下，現有各國軍艦駐紮，豈得謂爲絕對安全」。吾以爲南京城下之軍艦，絕無條約上之根據，與北京駐兵之因條約所規定者不同。中國可以即時據理要求其撤退。且二三小軍艦，孤立江中，又在獅子山幕府山鏡山諸砲台之下

，如有必要，不難於一二小時內，使其全滅。如彼使少數陸戰隊上陸，究爲數有限，可一鼓而殲之。非如北京外兵羣集藉使館區域爲城社，只許外軍砲擊北京城，而不許國軍之還砲。其安危又何如也？故吾敢斷言：欲免除各國武力之常駐的威脅，舍遷都南京外無他法也。

(乙) 外蒙與赤俄

白君謂「奠都南京，外蒙赤化勢將蔓延南漸」。此種理論，不知何所根據？赤化之南漸與否，豈亦繫於中國國都之南北而定乎？此種毫無意識之言論，實無駁辯之必要。白君又謂「苟遷南京，外蒙收復之功，尙多阻礙，不若北京奏效易也」。夫外蒙之收復與否，完全視軍事力量，與政治應付而定，果如白君所言，「北京奏效易」，則民國十七年間，經數代之政府，何以不特不見奏效，反日趨於赤化。即云北京接近蒙古，易聯絡蒙人感情，則建都南京，北京亦爲北方重鎮，現已有政治分會之設置，將來蒙藏委員會，或移設北京，亦非不可，則對於蒙事，自可措置裕如，豈必待國都移設北京而

後可耶？至白君所擬班禪於熱河行宮，令其兼充蒙古活佛，以爲收復外蒙地步之計劃，無論在今日蒙情變化，班禪有無統制能力，尙屬疑問。要之，白君萬餘言之大著中，已屬不可多得之語矣。

(B) 使館保衛界之糾纏

此件爲北京絕對不能建都之理由，前已屢言之。然白君窮迫之餘，妙想天開，竟敢謂若遷都南京，「則外人必以北京爲例，將在南京闢租地，設保衛界，……又將援例於滬寧間設置各國兵營」。吁！是何言也！此種荒謬絕倫之言論，以橫行無忌之日本只由其東方通信社發表一次，經中國全國一致之攻擊後，現已不敢再發。白君爲中國人，竟能發此喪心病狂之怪論，不能不使吾人疑爲外人作說客，爲帝國主義者當走狗也。以中國今日之實力，雖不能即時驅北京各國駐軍於國境之外，然各國豈敢無端以庚子城下之盟，再加諸南京耶？雖白君善於誘盜入室，彼亦常有所避忌。吾人論遷都正宜爲釜底抽薪之計，建都南京以避之，而消滅其京津駐兵口實，促其撤退。而白君乃別具肺腑，吾

欲無言。即令各國不贊成遷都南京，其唯一抵制方法，只有以使館不遷爲挾制之具。然使館不南遷，於中國不便之處少，於各國不便之處多。彼爲避免自身之不便，將不能不漸次南遷。此種形勢，現已明若觀火。况美國使館早有南遷之意，而日本民政黨，亦曾發表主張使館南遷之議論。（見十七年七月十日大阪朝日新聞）大勢一定，豈能久抗？所有建都南京之障礙，皆將消滅。而白君乃以此種議論，迷惑國民觀聽，此吾人所大惑不解者也。且使館保衛界之害，國人或尙有未盡悉者乎？界內各國駐兵防守，臥榻之內，已存無數敵國，前已略述之矣。所謂保護界內，除使館與兵營外尙有六國飯店，客利飯店，德國醫院，法國醫院，及無數之洋行住宅，皆爲通逃藪。凡謀叛政府之軍閥官僚政客，以及秘密結社之徒，無不恃爲藏身之所，每日運用其奪取政權之陰謀。是保衛界內，不特有無數外敵，且有無數內敵。譬諸人身，此爲符盲之疾，非藥所能醫治，除舍舊謀新外，殊無他法。又如各國使館，容留政治犯，雖爲國際法所許可，然使無廣大之保衛界，則政治犯不易逃入。即逃入矣，亦不易爲政治活動。且不易逃出使館，以遠

國於他處。然北京則由保衛界，以迄天津沿途皆有各國軍隊駐守。往往重要人員，皆能免脫。舉其大者言之：如徐樹錚溥儀之由日本軍隊運往天津，此盡人所知也。現徐樹錚雖伏天殊，而溥儀將來是否不被外人利用，以危害中國，尚在未知之列。是北京保衛界所危害於中國者已多矣。以如此危害中國之保衛界，中國尚須遷就建都北京以保存之乎？此真匪夷所思也！

四 兩京之宏狹

白君謂南京經洪楊及張勳兩度兵燹，樓台瓦礫圍圉邱墟，全城之半，宛若荒郊，不若北京之堂皇宏麗。此誠非虛。吾人以南京具新式國都之資格者，亦正以其多荒郊，易於根本的改造。政府正可利用其荒蕪，先立定都市計畫，將全市街道，依照最新式計畫劃定，寬狹既可隨宜，斜直亦可自若。如此，經久施設，則南京可成爲最新式完美之都會。北京已成之局，欲依新式改造，窒礙殊多。至北京之故宮，（應稱廢宮，姑依白君）及一切附屬房屋庭苑，雖云壯麗，然係帝制餘物，只可供遊人歎賞，不合共和國官吏

居住。從來掌撫北京政權之人，非帝制自爲，卽懸錢而不忍去者，蓋帝王思想之遺毒也。今既建都南京，從新建築平民式之衙署，則垂數千年專制餘毒，打破從來官尊民卑思想，名實相符。若如古世觀輩，身居皇宮，名爲總統，執政元帥，實與專制皇帝無異，蓋易薰習毀滅也。是白君所歎惜者，吾人方慶幸之不暇矣。至於休息遊覽之地，在南京如清涼山，鷄鳴寺，明孝陵等天然公園，亦不在少，只須略加人力，皆可資民衆娛樂。且新與國家，正宜全國上下，臥薪嘗膽，不必汲汲於此。（白君一面憂南京易陷於文弱荒淫之弊，一面又盛誇北京宮室苑囿之美，亦屬自相矛盾之一），若以爲種種新式設備，需要鉅萬金錢，此屬正當費用，視北京日在外兵包圍俯瞰之下，雖費錢倍徙，亦皆欲易我新居，所謂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正謂此也。至於南北兩京大小之比較，則南京面積較北京爲大，蓋北京內城周四十里，外城周二十八里，內城正南一方，包於外城之中，應除去十里，故內外城合計只周五十八里耳。而南京城則自明洪武初年改築後，橫縮紆徐，周九十六里。以中國第一大城，加以修築，他日蔚成新式大都市，詎不懿歎？

五 結論

白君所論各點，已逐條辯駁矣。一言以蔽之曰：白君大著，曲意推崇北京，不惜犧牲一切，或誤因爲果，或誤果爲因，或冠履倒置，或牽強附會，或互相矛盾，或支離滅裂。尤甚者，至僻寧無所適時時，則敢發爲荒謬絕倫之議論，雖招國人唾罵，亦所不辭。且其立論，不明瞭現代國都之意義，遂將數百年前之議論，以求適用於今日。並濫引似是而非之歷史地理，以眩其淹博，博取世人，而不知識者已竊笑於傍矣。若其議論，只在欺人，而與大局無關，吾人尙可隱忍。無奈其所論者，關係中華民國國命，若緘默不言，其貽誤國家，有不可勝言者。故不能不辭而闢之也。總之：定都南京不特可免脫各國之平時的佔領，免受地下之盟之苦，且可除舊布新，一掃惡習，以漸入於振拔強盛之域。至於從前之短促偏安，或係人謀不臧，或係時勢不宜，非地之罪也。總理獨見及此，固非庸俗所能窺其深遠也。

胡漢民先生說：

「南京是我們中國歷史的名都，尤其是總理十六年前開國的名都，總理逝世後，他的陵墓也在南京，所以總理指定首都在南京，可以說是生死與之的。……南京既是總理指定的首都，所以我們繼承總理手創的國民政府，必須在南京建都，來完成總理的遺志。」

（見胡漢民先生演講集第一集第一篇）

(一) 中國之國都問題

張其昀

——載東方雜誌二十四卷九號——

余近撰中國地志，於北京必須遷都之理由，嘗痛乎言之，其言曰：

『中國歷代京師風俗之不良，殆無過於現代之北京。北京爲官吏淵藪，自滿清中葉以來，官僚政治之腐敗，達於極點，習俗移人，積重難返。都下官吏莫不熱中富貴，揮霍自豪，上下相接，有諂媚而無忠愛。其作事也，初非本於學理，只以姑息之策，粉飾一時，寡廉鮮恥，未可窮述。間有天良未泯者，羣以迂謹目之，其不從風而靡者鮮焉。吁，自古有一國人士，知有財而不知有學，亦不知潔已奉公，名節蕩然，而國家可以勃興者乎！外人早以北京士氣之墜落，對於中國前途，下悲觀的觀察。民國元年，孫大總統之辭職也，堅持國都設於南京之條件。良以北京爲僞勢力所盤踞，人心塵濁，共和政體難以發長。而袁氏抗不履任，其帝制野心，已可窺見。唐紹儀云：「遷都之議，余自信甚深，今猶不改，遠觀世界各國，如俄羅斯，如土耳其，以及日本之

國都南京的認識

五七

維新，均以選都爲必要。蓋環境既變，入其地者，無不與之同化。」故爲民國之前途計，國都問題，實甚有討論之價值。」

吾國歷史上之國都，凡有六處：在黃河流域者三，曰長安，曰洛陽，曰開封，在大江下流者一，曰南京，在錢塘江口者一，曰杭州，在大運河北端者一，曰北京。二千年前，我國之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皆發軔於北方，而長安與洛陽，爲秦漢時之故都。太史公曰：「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最其富什居其六。」此就經濟言之也。班固曰：「自秦漢以來，關東出相，關西出將。」此就人才言之也。至西晉時，猶有「豫州人士常半天下」之語。據近人丁文江氏歷史人物之統計，河南一省在後漢時佔全國總數百分之三十七，可爲明證。尙有一事，在古代海運未興之時，中西之陸路交通，皆取道於西域，（今新疆省）而玉門關（在今甘肅敦煌縣）之地，遂爲中西交通之孔道。凡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之流入中國者，與夫中國文明之流入葱嶺以西者，必經此處。玉門關爲門戶，其堂奧則在長安，故長安在古代世界史上，

實居於重要之地位。然二千年來，南北之優劣，已倒置矣。隋書地理志曰：「天下之龍言，惟金陵與洛下耳。」隱有南北對抗之勢。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國越反爲天地之上。」是則南宋以後，文化中心，完全移於東南沿海。關中之鄭白二渠，在秦漢時溉田四萬四千五百餘頃，近時所溉不過萬頃，近時渭水全不入渠，惟用山泉灌溉，僅數百畝。劉猷廷曰：「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利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深沒民居。」誠可謂慨乎其言之矣。至於陸路交通，際此海運發達時代，中亞陸商之路，其重要亦遠不如前。陽關故道，徒爲考古學家之所探訪耳。開封爲北宋故都，一名汴京。汴河橫貫中國，西通黃河，南達江淮。東南漕米，由此而進，故宋人言「汴河爲建國之本。」及宋室南渡，汴河日就堙廢，元明以後，屢經河患，汴河故道，幾不可復問矣。明太祖嘗欲建都明封，（洪武元年，詔以開封爲北京，應天爲南京，尋罷北京，以應天爲京師）太平軍亦有此意，蓋以爲「大梁天下之中」也，然終以開封無水道，皆未成事實。

二千年來，吾國政治家有一最感困難之問題，卽北方游牧族之南下牧馬是也。漢文帝遣匈奴書曰：『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於單于，長城以南，冠帶之室，朕制之。』張騫通西域，其使命爲何？曰與大月氏締結同盟，以夾攻匈奴是也。張騫之使命雖未成功，然漢人卒能藉自己之力量，獲最後之勝利。匈奴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按張騫出使在西元前一三八年，漢武帝遣將攻取祁連山焉支二山，在元前一二一年，今日涼州甘州一帶之地爲漢所有，西域之道遂通，於是匈奴不得不退入沙漠中。）是爲漢族向外發展之第一時期。其後匈奴遠徙歐洲，今匈牙利國所由來也。隋唐之際，突厥最強，其版圖東起遼東，西達裏海，唐太宗高宗之世，平定東西突厥，是爲漢族向外發展之第二時期。突厥亦被迫西遷，今土耳其國所由來也。世界史上空前絕後之蒙古帝國，亦爲北方游牧族之所建設，當十三世紀之時，蒙古帝國之版圖，東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南至中國海，而其國都實在北京，卽元代之大都也。蓋就地文觀之，自蒙古高原以至沿海平原，級級下降，張家口

爲一級，居唐關爲一級，至北京則惟見平原位於叢山之中，形如海灣，地文學家稱之爲北京灣。長三千里之大運河，成於元人之手，而以北京爲終點。（按黃河以北至臨清間長二百五十里之運河，乃用三萬人之力開濬而成，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正月首事，六月告成，名爲會通河。臨清以北，又可利用天然水道。）舉東南之糧米，與西北之戎馬，而會萃於此，當時建國之形勢，大略可觀。蒙古帝國經百年而瓦解，明太祖恢復中華，以元人雖已退入沙漠，不無捲土重來之意，故命燕王（卽成祖）鎮守北京，後成祖卒遷都於此。東起山海關，西迄嘉峪關，今人所稱爲秦代之萬里長城者，其實皆爲成祖以後所築之邊牆，居唐關妙子關一帶之長城，則爲明代之內邊牆。（秦代長城遠在陰山，泥石雖已剝落，遺迹尙有可尋。）然終爲明人之禍亂者，乃滿洲而非蒙古，此蓋明初所不及料。滿洲以關東之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其所處之地位，與元人相等。乾康二帝南巡江浙，凡十二次，美其名曰省方觀民，實則示威運動而已。顧三百年來，時過境遷，不但在政治上，滿人之勢力完全失墜，卽在經濟上，因漢人移殖關東之結果，昔日之

牧場，已完全改造而成農業區域。滿人學漢語，改漢姓，新舊雜居，一視同仁，滿漢之界限可謂完全泯除。蒙古亦然，塞外草原亦為漢人之新農業區域，陰山以南，彌漫漢風。惟外蒙古尚未同化。最近因斯拉夫人之援助，成立蒙古民國，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舉行，外人謂蒙古已恢復其七百年前之元氣。外蒙問題與西藏問題乃二千年來中國民族史上碩果僅存之懸案。然民國果能實行真正共和，則蒙藏二族亦不患其不歸誠內向，即在蒙古民國，亦皆表示好意。現代中國政治家之大問題，不復為「胡馬」之問題，而為「砲艦」之問題。由此觀之，民國時代之建都於北京，除因襲前朝而外，別無豐富之意義，與宏遠之規模焉。

中國民族史上有二次大遷徙：其一，西晉之末，五胡亂華，洛陽淪陷，晉室南遷，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居六七，（如謝安原籍在今河南太康縣）是謂永嘉之亂。其二，北宋之末，金人入寇，汴京陷落，宋室南渡，北方人士亦隨之南下，（如岳飛今河南湯陰縣人）是謂靖康之擾。第一次遷都在南京，第二次遷都在杭州。南京形勢，長江環

繞於西，幕府山綿亘於北，鐘山峙於東，雨花台障於南，中爲寬平弘行之區，而秦淮河
玄武湖左右映帶，環境若斯，洵鉅觀也。杭州常錢塘江與大運河之交點，故宋時有蔭云
：「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時東門彌望皆菜園，西門則引西湖之水入城，
富陽桐廬一帶之柴，聚於江干，蘇湖之米，則由北門而入也。南京杭州與北方都會，
有迥乎不侔者，卽爲海道之便利。杭州在宋時爲中國四大商港（廣州泉州寧波杭州）
之一。歐陽修曰：「錢塘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船，出沒於波濤浩
滲，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惜自元代以後，錢塘江口淤塞，巨舶不能暢行，於是
南京與杭州，優劣遂分。明初建都南京，於清涼門外設寶船廠，所造大船長四十四丈四
尺，闊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闊十五丈，此卽鄭和所乘，泛滄海數萬里，而遍歷三
十餘國者也。鄭和出使西洋，通計官校，勇士，士民，買辦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餘人，
分載寶船六十三號之多。鄭和至非洲東海岸，在明宣德五年，卽西元一四三〇年，葡荷
牙人達非洲最南端之好望角，在一四八八年，尙在鄭和之後五十八年。其後四年，（一

四九二年，即明孝宗弘治五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鄭和之七次航海，其功業之炳耀，殊不亞於哥倫布之四次航海。惟自哥倫布以後，西角之海外探險，風發雲湧，天涯海角，有若比鄰。吾國自鄭和以後，不能再接再厲，致使海上霸權，為歐人之所獨佔。而我國人不知奮發自強，且以鄭和航海，為蹤跡建文之舉，事之可痛，孰有甚於此者。

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歐人皆視中國為天朝上國（Celestial Empire）。哥倫布之壯志，原欲來至中國印度，滿載絲帛香料，以餉國人；不料逕抵美洲，與馬哥宇羅遊記所載，不相符合，屢試無效，飲恨而終。即在十八世紀末葉，英國欽使馬加特尼（Lord Macartney）至北京，觀其法律之自由，商人之道德，謂皆愈於當時之英國。迨十九世紀英國之政治改革極速，而中國自乾隆以後，日趨腐敗；英人又因征服印度之易，益生非薄東方之心。自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毒藥戰爭，英國以其砲艦威嚇我國以後，訂約開港，割地賠款，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近代種種不平等條約之束縛，何一非列強砲艦政策之結果耶？同治八年（一八六九），蘇伊士運河開通，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

（西伯利亞大鐵道告成，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巴拿馬運河開通。六十年來，因三大捷徑之發現，遠東形勢大非昔比。日本明治天皇，自西京遷都東京，下詔求知識於世界，可謂有先見之明。（按明治元年（一八六八）詔改江戶爲東京，明治三年實行遷都。）日本之先覺，一方面吸收西洋文明，一方面保存東洋文明，妙合新舊，超凌此世界史上最危險之半世紀，以蕞爾島國，一躍而爲東亞之大帝國。我中國與日本，環境相同，而應變失策，甲午（一八九四）之戰，明效大驗，愛國之士，受極大的刺激。而滿洲政府，仍牢守其專制政治，中國人民雖欲自救，其道無由。故革命事業，從此發軔矣。（按吾國人對於西洋文明之態度，彼頑固派之一味輕視，其爲盲目，不足道已。近年來之新文化運動，則極端崇拜西洋文明，而欲排斥東洋文明以爲快，在吾人觀之，終以爲偏激太過。孫中山先生之主張，與日本先覺相同，卽凡西洋文明之優點，固宜「迎頭去學」，「期與西人並駕齊驅」；至於東方文明之真精神，亦宜發揚而光大之。不可因一時之挫折，將先民之良法美意，一概抹煞。厚誣古人。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六講（頁一二〇，一

二一）有言曰：『所以窮本極源，我國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開恢復。』說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國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孫中山之革命主義，與太平軍之鹵莽滅裂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此其一端也。）

孫中山曰：『原革命之目的，在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以獨立自由於大地之上，此與帝國主義，如水火之不相容。故帝國主義，遂與軍閥互相勾結，以為反動，軍閥既有帝國主義為之後援，乃悍然蔑視國民，破壞民國，而無所忌憚；革命黨與之為殊死戰，而大多數人民，仍守其不問國事之習，坐視不為之所，於是革命黨人，往往勢孤，而至於蹉跌。十三年來，革命未能成功，其端實繫於此。』既自民國元年以來，國事未

甯，軍閥生生不已，人民困苦無窮，以軍閥爲刀俎，以人民爲魚肉，凡中國無地而得安寧者，皆軍閥竊據之所致也。孫中山先生以廣州爲根據地，努力於革命志事之貫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本年七月，廣州國民政府，承先生之遺囑，出師北伐，賴先生不朽之精神，與人民熱誠之扶助，將士用命，已達其會師武漢之目的。大江下流聞風興起，十五年來，革命未就之緒，告成之期，諒不在遠。國民政府北伐之宣言亦有曰：「本黨深知目前中國之唯一需要，在建設統一政府，統一政府成立，則外足以抵抗帝國主義之恫嚇壓迫，內足以拒絕軍閥之禍國殃民。」（七月十三日發。）今者國民政府業已實行遷鄂，武漢將爲民國之新首都。此係一時之規模，抑永遠之計劃歟？國民政府當因應環境以求適宜，而非吾人所能推測。茲特就南京與北京之形勢，南京與武漢之形勢，大略比較如左：

甲 南京與北京之比較

（一）環境 二十世紀之時代，太平洋之時代也。英、美、日、荷、法、俄諸國，

其政治外交經濟諸大端，莫不以太平洋爲其角逐之所。而太平洋問題之焦點，厥惟中國。此觀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太平洋會議（即華盛頓會議）之召集，益可了然。自今後，我民國欲求國際地位之平等，務須開拓心胸，而以太平洋爲我活動之舞臺。故民國之新首都，當求海道之便利，實無疑義。民國元年，孫中山力爭國都之地點，豈惟所以謀國內之改造，抑亦所以謀海外之發展也。揚子江爲世界最完美之水道，而爲中國之大動脈，建都於此民族生活之大動脈，足以調劑南北之平，全國之福，莫過於此。昔人稱大江寧闊萬里，方舟上下，所謂取之左右逢其源。近世地理學家亦稱蘇湖以下之揚子江爲揚子灣（Yangtze Estuary），蓋其江流深泓，恍如海灣。故南京者，以河港而兼具海港之資格者也。北京乃一大陸之都會，而爲吾國鐵道系統之中樞，有京奉、津浦、京漢、京奉四大幹線。南京亦有津浦、浦信、寧湘、滬寧四大鐵路，由津浦而通隴漢，由浦信而通京漢，由寧湘而通粵漢，由滬寧而接滬甯，諸線完成之後，其形勢之浩繁，且獨北京而上之。北京之大陸性氣候，較南方尤爲顯著，南京冬夏溫度較差爲四十三度

北京達五十五度。北京夏季炎暑不減南方，冬季則苦於嚴寒，北京一城，家用之煤年約百萬噸，消費最鉅。北京花朝節（陰歷二月十二日）後，餘寒猶厲，狂風時作。每當風起，塵氛埃影，冲天蔽日，覷面不相識，俗謂之「刮黃沙」，月必數次，或十數次，或竟月皆然。范鎮詩云：「邊日照人如月色，野風吹草作泉聲，」善狀燕地風沙之景。以觀「春春三月，江浦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氣象迥不侔矣。

（二）人文 昔乾隆帝嘗有「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薈」之語。蓋自明清以來，北京建都，其人才與物力皆仰給于南方。（元明清三朝，歲輸南方漕米，平均四百萬石。）據近人張懋勳之統計，有清一代各省人才生產率之比例，浙江爲第一，江蘇爲第二，浙江佔全國總額百分之一，江蘇佔全國百分之一〇·六。日人桑原鷗鵬嘗就康乾二朝博學鴻詞科之人數，依其地域而區別之，謂康熙朝南方與北方爲四十二人與八人之比，乾隆朝爲十四人與一人之比。又清末開資政院，選碩學通儒十人，其中浙江六名，福建三名，江蘇一名，悉爲南士，南北文野之懸隔，殊爲可驚。所以然者，宋南渡後，河北

之地入於金元者，垂三百年，社會中健全分子，或慷慨死義，或遷徙南下，亂後遺民，屢受控制，不敢喘息，養成服從之性，隨隨之風；加以胡漢雜處，民氣每况愈下。明太祖之開國，以浙江人選籌帷幄之力爲多。明之亡也，反抗滿清之大人物，如黃黎澍爲浙江餘姚人，顧亭林江蘇崑山人，王船山湖南衡陽人。三大儒之教，於近代之革命主義，有極深之影響。而現代實際上致力於革命事業者，以廣東人爲尤多。大河南北，寂寥無聞，且爲軍閥與土匪之淵藪也。故南京建京，舍地理的原因而外，卽就南北民氣比較而論，已爲強有力之證據矣。（就此點言，武漢足與南京相比，將來川漢粵漢二路柙繼告成，以西蜀之天產，與南粵之人才，治於一爐，當爲中國文化，開新生命。）

乙 南京與武漢之比較

（一）境環 南京與武漢之地利，亦不能無所軒輊。武漢三鎮當江漢交流之會，附近湖沼極多，爲太古雲夢澤之遺跡。武漢號稱澤國，言其利，則帆檣成林，轉輸便利，所謂九省之都會；言其害，則每當夏秋之交，水勢暴漲，河工稍疏，堤防輒潰，每隔數

年，常有水災。最近如民國十三年七月，武漢三鎮完全爲洪水所包圍。民國十五年七月，武昌之金口堤又遭潰決，人畜漂溺，損害甚大。是以武昌省城，在治水上與軍路上，均爲無比之天險。但武昌城之面積，不過十二方英里，建設國都，尙虞狹小。南京則濱江一帶，多爲山鄉，深泓就範，故無泛濫之憂。北自幕府山，南至雨花臺，西起清涼山，東過紫金山，包含城中之地，已有二十方英里。近人易實甫詩云：『最是江南堪愛處，城中面而有青山，』蓋金陵湖山之美，杭州而外，殆無其匹。自六朝以來，湖濱多園林，鐘山多別墅，善加經營，足以避寒暑風日之酷。例如明代之大理院，設於太平門外，謝肇淛云：『余承乏留都比部，左鐘山而右玄武湖，出門太平堤逶迤二里許，春花夏鳥，秋月冬雪，四時景光，皆足娛人。嗣是（移官北平），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追思曩昔閒心樂地，詎可復得？』其名勝可概見矣。武漢之氣候與南京相差無幾，惜無深秀之山林，大別山高三百尺，鐘山高達千四百尺。明太祖詩云：『暑往鍾山阿，岩幽清興多；薰風自南發，森松鳴弦歌。』此種幽情，想爲武漢所未有。更就國際交通

言之。武漢距海口二千里，夏則增水期，大洋汽船可以逕泊城下，此在世界地理上，已爲絕無僅有之例。但滬漢鐵路，往返約需八日，較之南京，究竟太遠。

(二)人文 南京歷代建都，皆有民族獨立之精神。當西晉之末，中國大亂，河洛則異族蹂躪，江左則人文初啓。有志之士，收中原數十代之衣冠禮樂，草創江左，其責任至爲重大。過江人士，每至暇日，輒爲新亭（在今大勝關）之游，周顛中座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王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恢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卽此數語，已可代表南京歷史上之精神。南唐立國雖短，然諸葛文化與宋元文明實藉南唐爲津梁。明太祖以恢復中華爲己任，其諭中原微有曰：「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斃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南京在明代爲全國之首都，其國立大學，有日本高麗琉球暹羅諸國之留學生。蓋自洪武以來，亞洲沿海各國，奉表貢獻者，不下數十，所謂「九天開闢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誠中國史上光榮之故都也。民國元年二月十五日，孫大總統曾親往明孝

陵致祭，其祭文有「寶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膺啓後人，成茲鴻業」等語。武莫自三國以來，常爲軍事上之重鎮，孫權曾一度建都於此，時吳大帝黃武元年（西元二二二年）也。後以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就建業死，不就武昌居。」言其危險而卑濕也。黃武八年，權遂遷都建業。故武昌重要史蹟，惟有詩人謠歌之黃鶴樓而已。最近辛亥革命，武昌爲首舉義旗之所，與廣州之黃花崗，南京之孫中山陵墓，遙相輝映，同爲民族史上永久偉大之紀念。要之，南京爲最富於歷史興味之都會，李白詩云：「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文天祥詩云：「一片青溪月，偏於客有情。」仰高山而懷先烈，過城垣而思故國，無形中之流風餘韻，足以使人低徊流連，激發其志氣者，尤有無窮之價值，與超絕之地位焉。

十五年十二月草於上海。

陳英士先生說：

「……徵諸過去之事實，則吾黨重大之失敗，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誤之耶？抑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而反對之，致於失敗耶？惟其前日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皆致失敗，則於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張，不宜輕以爲理想而不從，再貽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憶往事，而欲痛滌吾非者也。爰隨昔日反對中山先生其歷致失敗之點之有負中山先生者數事以告足下，其亦樂聞之否耶？……及南北議和以後袁氏當臨時總統，中山先生當時最要之主張，約有三事：一則……二則民國須遷都南京也。北京爲兩代所都，帝王寢夢，自由之鐘所不能醒；官僚遺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滿，必使失所憑藉，方足鑄錫專制遺孽。遷地爲良，庶可滌滌一般環穢耳。……」

（見孫文學說附錄陳英士致黃克強書）

(三) 首都之國防上價值

張其昀

——載地理雜誌一卷二期——

讀李仲揆『國防與北防』

本月十一日出版之現代評論，載有李仲揆君國防與北防一文，其言曰：『中華民國的國防，究竟應該從何處下手，這就是我們生死存亡的問題……事實上，這進攻的民族，不待說，一個就是日本人，從東三省來，還有一個就是俄國人，從蒙古新近來，……首都設在金陵，為的是暫時避開他們的鋒鏑，好往前進攻，若是大家祇看見江南的美女玉帛，不到朔北風砂中打出一條生路，將不忍看見南渡以後的宋，重見在中國歷史上，嗚呼殆矣。』李君之文，可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獨李君謂金陵建都，係避敵人之鋒鏑起見，則大非吾人之所望，恐亦決非先總理主張遷都之深意。國民政府定都金陵，其意義至為豐富，而其第一重要之意義，厥為國防問題。蓋金陵之地理環境，在今後中國國防上，實有重大之價值，且在世界地圖上，亦居於極優勝之地位者也。

國都南京的認識

七五

英人科尼西博士著有世界國都通考一書。(Dr. Cornish: *The Capital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一九二二年倫敦出版)詳究世界名都之歷史，而得了一共同之原理，即凡國都之地位，恆於敵人之方向，針鋒相對，且在第一道防綫之內，所以然者，即不欲示弱於敵人。至於其他之條件，如國都常爲全國經濟中心，交通中心，以及形勢之險固等，均屬次要云云。科尼西博士論國都之地位，係就歷史事實歸納而得者，故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例如法國最大之敵人爲德國，德人由東北方而來，故法都巴黎位於法國之東北部，大戰之時，巴黎危如累卵，而法人終不願遷都，以示弱於德人，此其明證也。就中國歷史觀之，西漢時最大之敵人爲匈奴，匈奴之重心在今甘肅之祁連山，故長安都城在中國之西北部。北宋時最大之敵人爲契丹，契丹與宋以白溝河爲界，白溝河即今河北省大清河支流之拒馬河，故開封都城在中國之東北部。當西晉之末，五胡亂華，中原塗炭，北人南渡，定都金陵，當時敵人在北方，而以淮水爲第一道防綫，金陵之地位在南北朝時實居中國之北部。東晉立東，事極艱虞，時人議徙都豫章(今南昌)，或請

徒都會稽（今紹興），二論紛紜，未有所適，惟王導慨然言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遷都之議乃止，示弱二字，真江左夷吾之特識，史家稱南朝三百年之基業，王導之功也。今日之金陵，雖時代不同，而亦針對帝國主義進攻之方向，且在第一道防綫（即海岸綫）之內，孫總理欲定都於此，實欲表示我民族大無畏之精神者也。

孫總理嘗稱世界各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即英國美國日本俄國德國法國是。此六大國與我中國皆以海洋交通，英法日俄四國兼與中國壤土毗連，現在中國之國際地位，無日不處於強鄰環伺四面楚歌之中。英人羅素論遠東問題有云：「目前中國反抗外國的力量，實比歷年內亂，重要萬倍，此種情形，在經濟方面比政治方面尤爲切要。」故言中國之國防，海防與陸防，兩者不可偏廢，孫總理所以有海都陸都之說，惟海都當較陸都爲尤重，蓋中國沿江沿海一帶，爲經濟上最發達最進步之區域。彼日人敢於橫辱中國而毫無悔禍之心者，以日本爲世界第二海軍強國故耳。日本借我旗大，久假而不

歸。以旅順爲軍港，大連爲商港，英國在遠東之軍港在香港，美國在遠東之軍港在菲律賓之馬尼拉，俄國之軍港在海參崴。由此觀之，太平洋者，帝國主義周旋進退用武之地也。金陵當中國海岸線中路，又當江海交會之要衝，今後之中國欲謀國際地位平等，必須有乘風破浪之壯志，故曰中國之將來在海上。金陵建都，決非避開敵人之鋒鏑，正在冒鋒鏑而奮鬥，旗幟鮮明，灼然無可致疑者也。

前清浦局總工程師與人海定遠丹有言曰：「西歐與東美，爲世界工業最發達之區域，由上海抵彼二地，航程略等，而運輸之價值，因歐美商人互相競爭之故，亦復不相上下，是以上海在世界地圖上居最適宜之地位。」滬寧二城，朝發夕至，上海在世界之價值，亦即金陵在世界上之價值。是故今日首都之地理環境，從內陸而觀察之，可以發顯塞北與嶺南，關東與西藏；從沿海而觀察之，則操南北二洋之中權；又從世界而觀察之，則由巴拿馬運河而通東美，由蘇伊士動河而通西歐，大洋汽船，暢達直下，可謂取之左右逢其源。孫總理在建國方略提議築鐵道十萬英里，汽車路一百萬英里，造商船

一千萬噸，此條大之鐵路網汽車路網與航路網，皆以金陵爲提綱挈領之中樞，如是則金陵將成爲太平洋沿岸之第一都會，誠決決乎大國之風也。

論中國今後之國防，將成爲一大三角之形勢，以北平蘭州爲二基點，而以金陵爲三角形之頂點。金陵者，全國海陸軍之大本營，北平者東北陸軍之大本營，蘭州者西北陸軍之大本營，蘭州不便應付東三省，猶北平對於西藏有鞭長莫及之虞，故邊防陸軍，必立二大重鎮，藉收互相應援之功效。我中國今後之發展，有扼要之二語，其在海上，則曰「兵艦與商輪齊驅」，其在大陸，則曰「汽車與飛機合作」，此種物貨上之建設，既可足食，亦可足兵，無論爲平時或戰時，其爲國奔走之功用，無以異也，蘭州當爲全國汽車路之中心，孫總理所謂陸都是也。

蘭州（即皋蘭）之地，歐美學者極所稱慕，蓋蘭州拔海五千尺，氣候涼爽，無蚊蠅之擾，終歲可服呢絨，麥粉菸草，品質至佳，羊肉羊乳之廉美，尤爲他處所未見，自祁連山以至陰山，羊場洞開，皮毛充衍，在海陸軍用品中極不可少，其重衆蓋等於煤鐵，

蘭州爲蘭海鐵道預定之終點，將來可爲亞洲毛織業之中心。現在蘭州人口十一萬，種族複雜，凡天津四川新疆蒙古西伯利亞西藏之人，羣萃於此，印度人聞亦有之。中國之舊式交通，有南船北馬之稱，至於蘭州以西，長城以外，則通行駱駝隊。大抵沙漠中旅行速度，駱駝每日可行十英里，摩托車每日可行百英里，例如駱駝自張家口至庫倫須三四十天，牛馬車行程倍之，現在張庫汽車路成，二千三百四十五里之長途旅行，老於窺軍之人，可歷三天二夜之時間，直達庫倫，若乘飛機，中午自張家口出發，下午七點鐘可在庫倫晚餐，現代物質文明之進步，真有一日千里之勢。我國西北一帶，道路平坦異常，汽車通行無阻，况氣候乾燥，無泥淖難行之虞，因有此種特殊環境，故造一百萬英里之汽車路，其費用較造十萬英里之鐵路爲低廉，我國疆域幾何上之中心在涼州，涼州即在蘭州附近。全國道路建設協會，曾計畫全國汽車路，列爲經線四，緯線五，而以蘭州爲中心之點，騎車輪之有樞軸，其形勢之重要，可概見矣。

蒙古新疆西藏國際交通之路線，有四焉：一自哈克圖通庫倫，一自斜米巴拉廷斯克

通迪化，一自塔什干通疏勒，一自印度大吉嶺通拉薩，此四大路線，皆可以蘭州爲發軔之點。自蘭州經西甯至拉薩，中途爲青海草地，商旅結隊而行，向來須二月方達，將來若通行汽車，則一星期可達。此路本爲唐代官道，清代始以打箭鑼巴塘爲正道，然自青海進藏較自川邊往者，近一月程自蘭州經涼州出嘉峪關，至新驛哈密，分向天山北路，是爲古來中西交通之孔道。自蘭州沿黃河北岸，經寧夏而抵包頭，寧夏包頭間，一路平夷，輓車直馳，尤爲暢快。目前由包頭乘長途汽車至寧夏，兩日可達，包頭爲平綏鐵道之終點，平綏路在山西邊外有一要站曰平地泉，自平地泉至庫倫，約四百二十英里，比張家口至庫倫，路線縮短三分之一，將來平綏路擬自此築一支線，北通庫倫哈克圖，自張家口以東，熱河特別區與東三省，即日本人所通稱之滿蒙者，常屬於東北國防區域，而以北平爲軍事上之重鎮，自北平赴滿蒙之孔道有三：其一即張庫汽車路，其二自北平出古北口至熱河，經赤峯而至洮南；即預定之洮熱線，自洮南復經龍江（即齊齊哈爾）而達黑龍江上之愛琿；其三出山海關至瀋陽，循奉吉鐵道而至吉林，由吉林分道而

趨鴨綠江與松花江。伍朝樞云：『希望本黨國精神，由珠江揚子江黃河三大流域，最後發展至黑龍江流域。』是以北平雖已遷都，而在新中國之發展計畫，依然居於極重要之地位，但北平為北方之軍事重鎮，而非唯一之重鎮其地位蓋等於晉州，更不致以東北國防之故，而牽涉於國都問題，是乃彰明較著之事實，為吾人所深信不疑者也。

吳稚暉先生說：

『記得去年在徐州，遇見了馮玉祥同志，他說我們將來還是遷到北京去嗎？我說：很好，不過你可願意東交民巷存在嗎？呵！至於講到地位，北京，漢口，南京，都在中央。北京，漢口且不說，單說南京，陸上看起來，似乎偏東，但是從海面上說起來，南至新加坡，東面和日本，對分起來，也不少。南京建為首都，是總理理想的主張，總理還要將遺囑葬在南京。所以和說這一個問題，都不成問題。北京和南京兩兩相較，北京為齊齊，不過只能算是歷史上的陳列物。紅鬃頭，黃臉頭，不能就可算首都；南京固然簡陋，以前有人談起，建設上要表現出一些儉樸的美德來；不過首都都要致各國人觀瞻，不是代表一人，乃是代表一國的。……』

（見十七年六月五日中央日報）

(四) 國防與北防

仲授

——截現代評論第八卷第一百九十二期——

(上略)從地理方面說：據韓廷棟 (H. Huntington) 的研究，氣候和居民的能力，乃至文化的分配，有一定的關係。單就溫度說：太冷的地方固然不能養成強有力的民族和高度的文化，太熱的地方也同樣的沒有希望。韓氏的議論，雖然有許多細微的地方，過於拘泥，然而從大體上觀察，他似乎沒有錯誤。同在一溫帶上的居民，近熱帶方面的平均能力（特別體力），又不及近寒帶方面的。如果南北兩方面比賽的時候，假如其他的條件相似，終久祇有北方民族勝過南方民族；因為常居在較冷的地方的人民，不知不覺，養成一種堅忍耐勞而且兇毅果斷的性質。比如同是中國人，北人和南人比較，就一般說，性質和體力，已經顯然不同。現今文化的程度，北方也許較低，然而勝到耐勞和沉着兩點，普通的南人，不及普通的北人，是誰也不能不承認的。將來用人為的方法，使南北的文化，升到一個水平線上，終久北勝於南，恐怕是免不了的事實。再北就是

滿洲和蒙古了。然則滿蒙和中國本部比較，在地理上已經佔了優勢。換一句話說，從滿蒙方普發動的民族，常有向中國內地侵入的趨向。

其次從中國歷史上說：有兩項很奇特的現象。第一是政治社會狀況的循環；第二是每經過一循環週期，北方民族侵入的勢力加劇。從戰國說起：戰國百餘年，是一個混戰時期。過了這混戰時期，就是秦的短期統一。接着就西東漢的隆盛時期。過了這隆盛時期，就是大戰小康的三國。再就是東西晉的統一。由戰國到晉末，成一個循環的週期。南北朝的混戰，淝淝和戰國相似。隋的短期統一和秦相似。前後唐的文治武功，和西東漢相似，所以中國歷史家有『漢唐之盛』一說。五代割據正和三國大戰小康的局面相等。南北宋的統一和東西晉的統一，又隱隱相照。所以我們可以說由六朝到宋末又是一循環的週期。這兩週期中各時代的年數，除了漢和唐以及晉和宋兩統一時期有相當的出入外，其餘各時期大致相等。這真算歷史上的怪事，決不是偶然發生的。真正的解說，還要請教歷史和地理家。

何以說北方民族侵入的勢力加劇呢？在漢的時代，雖然有匈奴擾亂，然而僅限於邊境。到了晉的時代，簡直不斷的受胡人的侵略。六朝時代，中國的一大半，竟被胡人占去了。唐的隆盛雖然與漢相當，可是唐人抵當河絕的力量，真遠不如漢人對付匈奴的本領。宋振於金遊弄到南渡偏安，較之晉更可憐了。在六朝時代，胡人不過占去中國一半。而到了元朝的時代，整個的中國卻被北方民族征服了。

照循環的局面推測，元的時代，應該是一個混戰的時期，和魏國六朝相當。但是同時也是北族入侵最利害的時期（因與六朝相當。）兩種現象重複，結果祇現出一種最著的；猶之乎將紅黑兩色塗在一張白紙上，祇看得黑色，而看不見紅色。元的運命，祇有九十幾年；洽洽和六朝，戰國時代的年數相等。這也算是一種相當的證據。

明以漢族復興表示中國民族的反動；但是過了二百多年又給滿清滅掉了。所以我們可以說自從元以後，北方民族往南方侵入的勢力，更加利害了。因為北方民族的勢力一天利害一天，所以循環的局面，也不容易看出來。如果我們勉強一點說：從明成祖到清

道光帝的時期，在文化上也有相當的發展，似乎和東漢，前後唐相當。那末從太平天國一直到軍閥割據的中華民國，就應該和大魏小唐的三國，五代的時代相當。再亂說一句，由國民黨統一後今日的中國，便等於晉或宋了。注意這兩個時代，也就是北方來的民族，向中國民族進攻最利害的時代了。事實上，這進攻的民族，不必說，一個就是日本人，從東三省來。還有一個就是俄人從蒙古新疆來。

然則從地理和歷史兩方面看起來，我們不能不認定，俄羅斯（蘇聯）人也許不承認這個名義的存在，然而那畢竟是改略上的話。）和日本是我們的大敵。他們從北方來，更覺得可怕。不列顛帝國，自己已經成了槍弩之末。他最大的敵人就是蘇俄。所以他用遠方法和日本人要好，想俟那個「包圍蘇俄的新圈子」。就現在的局面上看起來，不列顛因為不得已非敷衍日本不可，所以我們可以預料英國決不會怎樣幫助中國，也決不致為大害。那末，以後我們的國防問題，簡單的變成對日俄的問題。我們對付的方法，不應該是退守的，是進取的。乘他們勢力還未十分去滿的時候，我們得趕上前去，抓住滿蒙。

千萬不可失掉地理上的優勢，重墜入歷史的圈套。首都設在金陵，爲的是暫時避開他們鋒鏑，好往前進攻，若是大家祇看見江前的美女玉帛，不到朔北風砂中，打出一條生路，將不忍看見南渡以後的宋，重見在中國歷史上，嗚呼殆矣。

東報論評云：

莫都南京，本於中山先生之遺志，於國民黨之主義固宜。當第一次革命時，中山先生本擬設首都於南京，嗣因譚職於袁氏，原定計劃無形打消。而國民黨擬移首都於南京，有種種理由：其一爲歷史的；其二爲政治的。無論南京於革命派有不能遺忘者，中山先生於第一次革命時就臨時大總統職即在南京，其陵墓亦建於是。往昔洪秀全氏創設太平天國，亦在此地；近者蔣介石氏執率北伐軍，於去年樹立政府於此，以迄今日。反之，北京爲北方軍閥之牙樞，軍閥領袖窟穴於此。屢謀構事，北方政情因之常難安定，故南方派因以此等隱憂，以移都爲得策。且北京爲清室三百年之舊都，今對清室，猶不少持尊崇之念者。依下述理由，南方派欲移首都於南京，其大勢蓋已決定矣。

（見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世界新聞社譯稿）

美國名記者密勒氏云：

「……猶憶一九一一年中華革命開始時，孫中山曾語余中國國都之由北京遷移，爲革命成功之條件，蓋中山先生深信欲革命成功，非與任何事物之可以代表滿清專制政府者完全脫離不可。中山先生對於此點，極爲堅決，且以此意告其黨員，至今國民黨員奉爲金科玉律。關於新中國國都位置問題，尙有重要的政治觀念繫焉。陳習可惡之不平條約之締結地，北京也。使館界中完全由各國主持，與北京其他各區完全獨立，此卽此種條約成績之一種表現。近年來最影響中國國民運動者，爲俄羅斯與土耳其兩國之革命。前者之勢力，現已消失，其原因在於俄國欲利用中國之革命，以遂其政治上之野心。但土耳其之榜樣，尤其自動取消治外法權之快舉，足使中國智識界興奮。俄土二國之革命，與其國都大有關係。土耳其之由康士坦丁遷都至偏僻荒涼之安卡拉，而重新努力於建設的國家政策，結果成績大佳，全亞民族，無不注目之矣。……」

（見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央日報）

